一五一十周刊

NO. 127
2013年10月18日

徐琳玲：切·格瓦拉--他的国不在地上，也不在天上|张铁志：格瓦拉最迷人的部分|羽戈：阿连德与聂鲁达

离开格瓦拉的日子：革命理想碰撞社会现实



编者的话

10 月 9 日是切·格瓦拉的忌日。1967 年的这一天，他在玻利维亚遭处决。他的肉体早已消散，但他的肖像却成为了世界上最流行的符号之一。现在的人们也许不记得格瓦拉的具体经历和主张，却为他英俊和不羁的肖像痴迷。

在他死去近半世纪后，我们试图回答：切·格瓦拉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为何成为一个符号？如果革命、理想和激情是他最重要的标签，那么这三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期一五一十周刊带领大家追溯格瓦拉的生活、事业和文化遗产，进而一探革命理想与社会现实碰撞后产生的电光火石。

徐琳玲笔下的格瓦拉，潇洒中又透出一丝寂寞。青年时在南美大地旅行的经历，使他近距离目睹了底层的痛苦，从而踏上革命之路。作为执政者，格瓦拉将古巴经济带入低迷；他的工人始终没体现出预期的责任感，而革命理想使他拒绝以物质利益提高生产力和积极性。作为革命家，格瓦拉在古巴之外训练的游击队始终不令其满意，使他的日记中出现了“累积了”和“极度衰弱”的字眼。玻利维亚政府军的一次围剿，结束了他 39 岁的生命。

在世界为格瓦拉叹息的时候，胡泳则呼吁“严肃的反思”。毕竟，格瓦拉曾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他在不公面前奋起反抗，因为他热爱一个称为“人类”的概念。在持反对意见的“个体”面前，他又表现得冷酷和嗜血。他期待的是“集体的无私、牺牲和奉献”，不是“政治自觉与独立头脑”。

虽然格瓦拉的性格带有理想与冷酷的两个极端，但世界记住的大都是其理想的一面。张铁志观察到，格瓦拉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在反 WTO 的游行队伍里，青年们穿着带有格瓦拉头像的 T 恤衫。这是其肖像商品化的结果，却也意味着反暴力与反压迫的前沿阵地依旧需要格瓦拉的精神感召。只是大众对格瓦拉的印象停留于表面，甚少思索他的真实追求。

在世纪之交，格瓦拉被搬上了中国的话剧舞台，一时好评如潮。该剧的编剧黄纪苏则坚信，格瓦拉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有特殊价值。斯大林、波尔布特等理想主义者的革命不是失败了吗？是的，但说一件事情历来容易，做一件事情却很难。人类对不公平提出质疑，去挑战现状和“向更好的方向去”，本身有问题吗？更何况，今天的世界也没那么美好。不过，周濂的观后感提供了批判的视角：格瓦拉凭什么被塑造为无可指摘的道德圣人？难道类似的话语霸权和道德偶像不该受到质疑和反抗吗？

理想诚然不可一蹴而就，但其对现实的影响不可小觑。放眼世界，有多少理想主义者与格瓦拉有异曲同工的经历？羽戈笔下的智利人阿连德，和格瓦拉一样拥有医学的背景。然而当他充满理想气息的手术刀伸向国民经济和政治体制时，物价飞涨、工人罢工、地主反抗、中间派右倾，最终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

陈仲丹文中的恩库鲁玛，是加纳独立运动的领袖，享有“国父”的美誉。但当其抛弃执政初期的民主思想而走“非洲社会主义”和“泛非洲主义”路线后，却导致了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商品匮乏，以及政治上的一党独大，直至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

周刊最后将目光投向中国。戊戌变法的半途而废曾让多少人扼腕叹息。然而萧功秦在阅读史料时发现，“庸医杀人”或许是对当年康梁变法的中肯评价。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某些改革建议也显得荒诞不经：将西藏卖给英国换取财政收入，俄国不是也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了吗？让全国人民都穿西装，明治维新的日本人不是因为穿了西装才精神焕发的吗？一群激情洋溢的书生和年轻的光绪皇帝，终于遭到保守派的镇压。



理想让我们有所追求，但做成一件事情却不能仅凭理想和激情，更须警惕可能被理想合法化的暴力。像中国一位领袖说的那样，革命绝非“吃饭”、“绣花”一样简单。但稍不留神，就真成了“暴动”。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忆】

8-1 徐琳玲：切•格瓦拉——他的国不在地上，也不在天上

徐琳玲：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切•格瓦拉变成了一个符号，以纪念的名义反复出现，却终被遗忘和抛弃。追溯他的一生、他的理想与20世纪的拉美革命浪潮，他的《页边笔记》里神秘人的预言，或者是对他最好的盖棺定论：“你不是一个象征，你是正在崩溃的社会中真实的一 员……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1967年10月8日，39岁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处决。45年过去了，他变成了一个符号，以纪念的名义反复出现，却终被遗忘和抛弃。追溯他的一生、他的理想与20世纪的拉美革命浪潮，他在25岁时写下的《页边笔记》里神秘人的预言，或者是对他最好的盖棺定论：“你不是一个象征，你是正在崩溃的社会中真实的一员……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许多年后，已渐渐丧失记忆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家中，或许还能想起那个贝雷帽上别着一枚红星的切・格瓦拉上校。

1959年的哈瓦那，32岁的马尔克斯应邀参加了古巴的革命胜利庆典。随后，他在格瓦拉领导下的拉丁通讯社当记者。因为革命阵营内部不和，马尔克斯工作一年后，选择离开，辗转至墨西哥。

数年后，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巨著《百年孤独》问世。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沧桑的笔调写下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编织了一个现实与幻想交错的拉丁美洲世界。

如果要写那位格瓦拉上校呢？



马尔克斯曾说，他需要准备 1000 年、写上 100 万页。

青少年“切”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拉丁美洲世界：残忍，虚伪，无知又愚昧。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比他们更可悲地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在文明世界所赋予的国际分工里，他们提供的是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得到是毁坏的土地、靠军事维持的政府以及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他们也习惯用疯狂来反抗这种命运。仅在 1960 年代，拉美总共爆发了 16 次军事政变，有 10 个宪政政府被推翻。

生长和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切·格瓦拉，同样带着死亡和暴力的宿命。

喜欢赋予他受难者形象的人可以说，“切的一生，甚至包括他的死亡，都是一场对病魔的抗争”——1928 年，格瓦拉一出生就被查出遗传性肺部充血症，终生都受严重的哮喘困扰。

格瓦拉的反叛和冒险，来自家族的遗传。

格瓦拉的外祖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权势人物，出身上流社会，是一名激进的党派人士，因为一战前夕的悲观政治氛围加之自身疾病，在欧洲自杀。他的父亲林奇来自一个没落的西班牙贵族家庭，家族谱系中出过不少冒险家，有新西班牙总督、殖民地城市创始人、淘金者、寻宝人……

在其一生中，母亲赛莉亚与他维持着一种牢固的、排他的情感和精神纽带。赛莉亚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模范母亲，她天生鲁莽，总是被危险吸引，常常做一些挑衅社会规则的事情。在当地社会里，她创造了很多女性的“第一”，譬如开车、穿长裤、抽烟等等。有一次，怀着 6 个月身孕的赛莉亚下河游泳，差一点被急流冲走。据林奇回忆，她在结婚头几年里遭遇了好几起类似的溺水事件。

和她父亲一样，赛莉亚热衷政治，无论是在阿根廷历史上“最羞耻的 10 年”和贝隆时代，或是 1930 年代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反排犹运动、二战以及后来的支持古巴革命的过程，她都活跃其中。尤其是格瓦拉走上政治舞台后，她成为儿子事业最忠诚的追随者和传播者，与炸弹、入狱都沾了边。

格瓦拉热爱小说、诗歌和哲学。他继承了母亲的性格，追逐危险、天生反叛、无所畏惧，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出位小子”，总是做一些引人注目的恶作剧。似乎是对哮喘病的一种反抗，小格瓦拉展现出一种强烈的竞争人格。



这个没落的贵族家族经济上已沦为中产阶级，但仍过着优越的生活。格瓦拉一家属于偏离信仰的天主教徒，到格瓦拉上学时，他们已经不去参加教堂的弥撒，并要求他们的孩子免上宗教课程。

1930年代，二战前夕的南美洲涌动着不安定的气氛。在阿根廷，西班牙裔分成共和派和佛朗哥派，每天都在口诛笔伐。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进阿根廷。格瓦拉家收留的流亡者中，就有西班牙共和国卫生部长胡安·贡萨雷斯·阿吉拉尔博士一家。两家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战局和各种反法西斯话题。

不甘于清谈的格瓦拉一家联络朋友，成立一个旨在援助西班牙政府的“阿根廷行动”委员会，为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战斗募集资金。

从1930年到二战爆发，阿根廷一直由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1943年6月3日，一个名叫“军官联盟组织”的地下军队组织发动政变，陆军上校贝隆是幕后的首脑。之后3年里，他逐渐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端，成为阿根廷实际的掌控者。

贝隆以铁腕和开明统治着阿根廷，他提出了一种融“正义主义”、“民族主义”、“劳工主义”为一体的政治理念。经济上，他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在经济上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在对外关系上，主张拉丁美洲一体化，由阿根廷充当领导角色。同时，他反对美国插手南美事务，尤其是反对美国干涉阿根廷内政。

1945年10月，首都卫戍部队军官发动政变，贝隆被扣押，随后被流放到一座海岛。然而，政变者也拿不出新方案，内部争吵不休。

贝隆的支持者在几小时内调动起“400万人的劳动大军”，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要求政变者释放贝隆。贝隆的情人、女演员爱娃·杜阿尔特在这次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贝隆最终得以重获自由，并在1946年2月大选中大获全胜，6月4日就任阿根廷总统。“贝隆主义”终于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意志，进而演变成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

在阿根廷的政治风云中，年轻的格瓦拉只是一个旁观者。从中学到大学，他对政治只有泛泛的关心。他一面就反法西斯发表激进的言辞，一面对激进的政治活动漠不关心。20年后，格瓦拉在给一位编辑的信中说：“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没什么社会见解，没参加过阿根廷的政治斗争和学生运动。”

据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回忆，格瓦拉对美国怀有强烈的敌意。“在他眼里，拉丁美洲有两个恶魔——一个是国内的寡头统治，另一就是美国”，他深信是魔鬼的黑暗之子引导了美国在海外的每个举动。



有大量的事实让拉美人怀着这样的不满。二战后，美国在拉美地区雄心勃勃地追逐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对当地发生的社会变革漠不关心。为了和苏联冷战，美国牺牲了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左翼政党，去支持一批右翼军人的军事专制统治。

一张摄于1948年的照片展现了格瓦拉学医时期的精神面貌。在一具被剖开的男尸后边，身着白大褂的他和另外30名同学站在后面。照片上的格瓦拉笑得一脸灿烂，十分诡异。

他的阅读量和涉猎之广令人惊讶。在哮喘病发作的日子里，他靠书籍来打发时间，弗洛伊德、社会小说、哲学，也包括《资本论》。根据一份他当时手写的读书笔记，年轻的格瓦拉关注爱情、永生、性道德、死亡、上帝、魔鬼、幻想、理智和神经质等话题。

一头褐发的格瓦拉已经是一个英俊的大男孩，对自己的外表漫不经心。除了性和女孩之外，他向往着冒险与新鲜的刺激。

1950年1月1日，22岁的格瓦拉开始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冒险。他骑着一辆装着小发动引擎的旧“米克伦”牌自行车，踏上了全程长达4500公里的内陆地区旅程。中途，在麻风病院工作的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也被说服，加入了他的队伍。

这也是格瓦拉第一次跨越舶来的欧洲文化，深入阿根廷的内陆地区。这些地区为拥有大片土地的政治寡头家族把持着，他们和他们的祖辈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许多印第安人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他们是被歧视的群体。

格瓦拉探索世界的流浪癖被唤醒了。6周后，他赶在开学之前回到医学院准备考试。在此期间，他第一次真正坠入爱河，他的恋人叫奇奇娜，是阿根廷一个豪门家族的女继承人。他向奇奇娜求婚，并提议他们乘坐旅居车横跨南美度蜜月。这段浪漫曲遭到了奇奇娜父母的强烈阻挠。

1951年10月，他和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商定：骑着格拉纳多的“威猛”摩托车环游北美。格瓦拉第一站赶往米拉马尔的度假胜地，奇奇娜正在那里度假。他握着姑娘的手，对方没有给他等他回来的许诺，但留下了他送的一只小狗，名字叫“回来”。

在旅行中，他收到奇奇娜寄出的分手信。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几乎都是命中注定的。我的命运就是远行。”

两个年轻的流浪汉一路风餐露宿，穿越南美大草原。等口袋里的钱花完后，他们开始伸手向人要食宿，并竞赛看谁更擅长要白食。遭到拒绝时，他们搭帐篷过夜，或者在警察局和罪犯们一起吃牢饭。每到一处，当地报纸对两位来自阿根廷的“麻风病专家”热情报道，这为他们“骗得”不少白吃白住的机会。他们沿路拜访麻风病院，有时也打工换一点路费。



除了姑娘、新奇和刺激，他一路看到了贫困、病痛、被欺压的印第安人。

在秘鲁一家麻风病院，医务人员为他举办了24岁生日聚会。格瓦拉发表了一篇题为“拉丁美洲人”的演说：“我们坚信，（拉丁）美洲分化成为虚幻、不确定的多个国家，这完全是假象。我们要组成一个单一的混血种族，从墨西哥湾到麦哲伦海峡的广大地区有着明显的人种相似性”，最后，他提议，为“摆脱狭隘的地方主义”、为“团结的美洲”干杯。

他履行对父母的承诺，准时回到阿根廷，为即将到来的医生资格考试做准备。此时阿根廷发生了一件大事——32岁的贝隆夫人因癌症去世。阿根廷的局势进一步复杂，不时爆发各种游行、示威、抗议。在整理这次旅行笔记时，格瓦拉写道：“一踏上阿根廷的土地，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个人就死掉了……我不是我了；至少我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美洲流浪给我的改变比我认为的还要多。”

多年之后的一次谈话中，身为古巴政府领导人的格瓦拉说：自己学医时，曾经梦想成为“著名的研究者”，“我梦想不知疲倦地为帮助人类而工作”。在环游了整个被“苦难、饥饿和疾病”折磨的拉丁美洲后，他的政治意识才开始萌发。

我的朋友毛泽东召唤我

顺利通过医生资格考试后，25岁的医学博士决定开始第二次拉美之旅。在新日记本里，格瓦拉意气风发地高呼：“一个美洲战士出发了”，“两个独立意志在美洲大陆上前行，不知道他们寻找的是什么，不知道哪条路是往北的。”

母亲的本能让赛莉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送别儿子的站台上，她忽然抓住了家人的手，绝望地说：“我的儿子走了，我再也看不到了。”当火车开始缓慢地行驶，她追着车厢奔跑，挥舞着手帕，泪水从脸颊上滑落。

整个拉丁美洲正处于政治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长期在政治上从属于美国、经济上依附于美国的现实，令人们产生了普遍的不满。由西蒙·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开创的拉丁美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撼动着这片土地。

1952年3月，古巴发生武装政变，军事独裁者巴蒂斯塔第二次上台，他解散议会、废除1940年宪法，进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在阿根廷，执政已满5年的贝隆修改宪法，为自己二度当选扫清障碍。与这些“倒退”不同的是，在玻利维亚，爆发了“四月革命”。

两位旅行者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玻利维亚。格瓦拉希望实地考察这个国家在“革命”后的新气象。政变后上台的民族革命组织解散了军队，将全部矿业收归国有，他们正在推行一项引起激烈争论的土地改革。



街头酝酿着一种不安的气氛。格瓦拉特意跑到已被收归国有的钨矿区参观。在那里，他看到了拉丁美洲依附于美国的证据，他写道，“这是惟一支持玻利维亚前行的东西；这是美国要买的矿石”，只要美国还控制着矿石的出口市场，这个国家就不能真正实现独立。

在古巴，一件与格瓦拉未来命运相关的事件正在发展中。7月末，一群年轻的武装叛乱分子发动了旨在推翻军事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军事行动，他们攻打了两处兵营。叛乱遭到镇压，幸存者被捕入狱。领导这次行动的是一对兄弟：26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弟弟劳尔。

在法庭上，律师出身、天生的演讲家菲德尔发表了著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判我无罪》。他抨击古巴独裁政府对起义者的血腥镇压，指出古巴国内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并提出把财富归还给人民和打断新殖民主义依附的锁链。

通过报纸，卡斯特罗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格瓦拉的耳朵。他为这一对年轻英雄的社会理想和命运唏嘘不已。

1953年底，格瓦拉在厄瓜多尔、巴拿马、哥斯达黎加一路游荡。路上，他不断结识来自拉美各国的各种政治流亡者和激进分子，和他们成为朋友。新发现的兄弟友谊令他陶醉，他对朋友说，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同志情感，这是他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在新朋友中，不断有人推荐他去危地马拉看点“新鲜的东西”——他们告诉他说，“新的左派革命”在那里正在挑战美国的势力，其结果可能决定拉丁美洲的未来命运。

在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和美国的矛盾激化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一年前，他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征收了美资跨国公司的22.5万英亩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艾森豪威尔政府威胁阿本斯：将用武力干涉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者”。

数百名左派的拉丁美洲政治流亡者和激进分子聚集，也有像格瓦拉这样想亲眼目睹“社会主义”实验的青年人。每天，他都在结识新朋友，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流亡者在一起探讨和辩论，他读了更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书。毛泽东的关于“新中国”的书吸引了他，他在家信里告诉父母：他会认真地做一个医生，“直到我的朋友毛泽东召唤我。”

格瓦拉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在给舅妈的信里，他以慷慨激昂的姿态宣告自己的信仰：“我的生活就是一潭死水，直到我扔掉了行李和肩膀上的包……走过曲折来到这里……我在斯大林同志的画像前宣誓，在看见这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消失之前，我不会停歇。”

署名是：“您钢铁铸就的、肚子空空的、充满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的侄子。再见，猪猡敬上。”



5月，阿本斯政府和美国之间彻底谈崩。6月，由美国武装并训练的雇佣军开始轰炸危地马拉。军队叛变了，阿本斯总统躲进了墨西哥大使馆。美国人所扶植的“解放军”首脑阿马斯成为新的总统。

格瓦拉后来回忆说，在危地马拉，他开始研究成为一名革命医生的可能性。可是，随后阿本斯政府被颠覆了。“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根本现实……首先必须要有革命，一个人独自努力，不论理想有多纯粹，都是没有价值的。要想有作为，必须开展革命。”

在空袭的炮火中，上了骚乱分子“黑名单”的格瓦拉匆匆离开了危地马拉。离开时，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切”。这是古巴政治流亡分子尼科·洛佩斯给他取的绰号。在瓜拉尼语中，这个字代表惊讶、喜悦、悲伤、温存和愤怒。

“切”，后来成为格瓦拉最响亮的名字。

成为红色的“切”

危地马拉的第一轮空袭，让格瓦拉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看到人们在炮火中发狂奔跑，他有一种“不会受到伤害的奇妙感觉”，这让他“得意地舔了舔嘴唇”。

到墨西哥城后，格瓦拉遇到了他在危地马拉时的朋友。给他取名“切”的古巴人尼科告诉他一个消息——卡斯特罗兄弟及其18名追随者遇赦，离开松树岛。他们正聚集在墨西哥，组织和策划武装起义。

这让彷徨中的格瓦拉异常兴奋。在尼科的安排下，几天后，他和劳尔·卡斯特罗在一个小公寓里见了面。两人立刻打得火热。他们的思想很接近——劳尔是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大学时代就加入了古巴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

7月，菲德尔也抵达墨西哥。交谈一阵后，他邀请格瓦拉加入他的游击队伍。

“切”——古巴人已经开始这么叫格瓦拉了，他成了他们的医生。卡斯特罗野心勃勃的计划刚刚开始，而这正是格瓦拉梦寐以求的事业。他觉得与菲德尔的相识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时刻，菲德尔“年轻、睿智、非常自信、勇气非凡。我觉得我们意气相投”。

卡斯特罗是完美的政治动物。他出生于古巴一个种植园主家庭，从小到大接受最好的教育。从学生时代就投入到反政府的政治运动。他富有领袖魅力，擅长政治手腕，一直把自己视为古巴的未来领袖。

他对“美国佬”恨之入骨，认为是美国人把独立的古巴变成了“伪共和国”，任由腐败、残暴的独裁统治在古巴扎根，美国人应该为单一依赖出口的古巴经济负责。



格瓦拉的眼神，总让人想起流浪诗人或者舞台剧演员。他同样具有强烈的自我，但他更渴望被接纳，成为同志中的一员，而非领导者。两人都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超越生命的使命感，都想直接参与历史。他们也有共同的敌人——“美国佬”。

格瓦拉加入了古巴的起义军，他把卡斯特罗视为领袖。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古巴革命并不了解，更多是被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所吸引，还有自己那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当时我想，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战死在异国的海滨浴场，倒也不是一件坏事。”

在卡斯特罗的训练营里，格瓦拉参加了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同时充当随队军医。他的“政治委员”身份也在那时确立起来，在业余时间，他教学员认字，给他们讲革命故事。

切依然徘徊在马克思主义和诗歌之间，他心里还在计划着天马行空的旅行计划。一年前，他曾吐露自己对参与社会运动的矛盾心情——“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浪汉，不愿意用铁的纪律断送我的前程。我完全相信，我所信仰的会最终获胜，可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将是参与者，还是此行动的观望者。”

命运很快为他做了选择。

1956年6月，墨西哥警察突然袭击了圣保罗庄园，逮捕了格瓦拉和其他成员，随后在别处逮捕了卡斯特罗。在律师们的活动下，卡斯特罗在7月24日顺利出狱，只有切和另一位成员加西亚还关在监狱里。

远征的计划暴露了，情况非常紧急。格瓦拉得知后，让卡斯特罗只管行动、不用管他，可是卡斯特罗发誓说：“我不会抛弃你们。”这种姿态让切深深震撼——“这是他能动员所有拥护者们疯狂地追随他的关键” 。

这次入狱，使得格瓦拉彻底放弃波西米亚人的流浪梦想，全身心投入卡斯特罗所领导的暴力革命运动。

扬名天下

11月25日凌晨2时，一艘破旧的美国产快艇——“格拉玛”号运载着82名远征军和大量武器驶出了墨西哥湾。经过7个日夜的颠簸，最终在古巴奥连特省科罗拉达斯海滩登陆。

上岸一小时后，起义军就被政府军发现。被打散后，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分散行动，在大森林里前行。会合后，继续向马埃斯特腊山进发。1957年初，起义军终于进入绵延险峻的马埃斯特腊山。



1 月 17 日，起义军第一次战役打响了，他们对图尔基诺山下的一个政府军兵营发起进攻，大获全胜。鼓舞士气的同时，也击碎了之前政府在民众中散布的关于远征军全部被歼灭的假消息。

在这场战斗中，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两名最勇敢的司令官脱颖而出。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格瓦拉冒着枪林弹雨，一举炸掉了敌人的飞机库，从而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他不时受到哮喘病的折磨，肾上腺激素已经用完，完全靠意志力支撑。

在起义军里，格瓦拉充当了三重角色：军医、杰出的战斗指挥官和出色的政治委员。

参照中国的革命经验，卡斯特罗决定建立根据地。这首先要得到当地农民的信任和支持。格瓦拉开始运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他找当地农民聊天，揭示命运的不公平，还和他们讲述遥远的东方农民的故事。他背着药箱，深入山区村落为农民治病。

作为毛泽东的“学生”，格瓦拉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更适合古巴，必须采取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率第四纵队开辟一个解放区。渐渐地，起义军和农民之间有了联系，农民们开始为起义军提供食宿、通风报信，还有参军的。

马埃斯特腊山的战斗进行时，在古巴全国，各地各种形式的反政府斗争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为了谋求古巴中间派的支持，在山区的帐篷里，政治手段老练的卡斯特罗和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反对党派来的代表签订了协议。

和格瓦拉的天真不同，卡斯特罗在政治信仰上的立场一直暧昧不清，他随时根据政治结盟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立场。这种老练多变的态度，伴随着他之后和苏联、美国的关系。

这让格瓦拉非常失望，他在日记里记录下自己对这些“走中间路线”的政客的不信任和鄙视。但卡斯特罗说服了他，强调里头会包括一项制定土地改革的基本条款，而且，那只是权宜之计。

7 月份，卡斯特罗意外地晋升了格瓦拉的官职——这是极高的荣誉，上校是起义军的最高官衔，之前只有卡斯特罗一人担任。何况，获得此项荣誉的还是个阿根廷人。

卡斯特罗的情人兼秘书塞莉亚·桑切斯亲手把一枚金星别在了格瓦拉的贝雷帽上。这枚小小的金星、雪茄烟和马黛茶，日后成为格瓦拉个人形象的主要标志。

“这点虚荣让我那天感觉到自己是全世界最骄傲的人。”在这支古巴人的队伍中，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迫切需要更多的战斗胜利来证明自己能胜任这个头衔。

1959 年 1 月，卡斯特罗的部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古巴革命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拉丁美洲。在格瓦拉故乡，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位“阿根廷的年轻医生”。他的英俊容貌和传奇色彩，让他在一夜之间成为无数阿根廷少女梦中的白马王子。

格瓦拉一家受到邀请，坐飞机抵达哈瓦那。看到已 6 年未见的长子，赛莉亚激动地一把抱住他，热泪横流。

古巴的革命胜利，也点燃了许多欧美左派知识分子对“理想国度”的想象。1960 年，他们群集哈瓦那召开文化大会，其中就有萨特和波伏娃。这对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格瓦拉交谈了数小时，给萨特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当萨特得知格瓦拉的死讯后，给出那句极高的赞誉：“切不仅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二号人物的“新人理想”

在古巴，老林奇和儿子的相处并不愉快。

他发现儿子成了一个强硬的陌生人。一天晚上，他决定去儿子工作的卡瓦尼亚堡看看。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切在质问一个执勤的年轻人，缴了他的枪，并用冰冷的语调下令逮捕他。林奇回忆说，“我看到那孩子脸上绝望的表情。”

在卡瓦尼亚堡，“最高检察官”格瓦拉正忙着革命法庭的审判。新革命政权的首要任务是清洗和镇压政府、警察、军队中的传统势力。每天都有疑犯被带到他的法庭。在随后几个月里，整个古巴共有几百人被处以极刑。

《格瓦拉传》作者、美国记者安德森采访到参与当年“清洗”工作的当事人，这位当事人回忆说，由切作出最后判决，他还是非常谨慎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格瓦拉说自己不参加审判，从不亲自见被告，只根据证据核查案子，这样才能客观、中立地作出最终判决。

“清洗运动”在国外引来强烈批评，美国公开指责古巴革命政权是在进行大屠杀，古巴的报纸也呼吁不要“使得古巴人流更多的血”。

所有的矛头都集中到格瓦拉身上，把他的名字和“恐怖统治”划上等号；又因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更被人称作“莫斯科伸向古巴的手”。

1960 年，格瓦拉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该报道在大力描绘他在女性中的性魅力之外，忧心忡忡地指出：格瓦拉是古巴 3 人执政中最危险的一位。

在古巴，他正式成为新政权的“三巨头”之一。在西恩富戈斯飞机失事后，革命政权的核心人物就只有卡斯特罗兄弟和他了。



革命后的第11个月，格瓦拉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1961年2月23日，他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兼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由此，卡斯特罗把经济和财政大权都交给了他。

格瓦拉对此讲过一个幽默段子："有一次，菲德尔把他的同志们召集起来，问我们中间谁是经济学家。我于是举起了手，菲德尔非常诧异地问我'你什么时候起成为经济学家的？'我回答："对不起，我听错了，以为你问我们中间谁是共产党员。'就这样，我被将错就错地任命为国家行长了。"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项荒唐的决定，从老林奇到熟悉格瓦拉的新闻记者。格瓦拉的任命一公布，立刻引发了古巴的金融恐慌和银行挤兑。

这位经济和财政的"门外汉"、极端仇视金钱的诗人以挑战风车的姿态，领导古巴的经济建设。作为国家银行行长，把用自己的名字"切"签署在新发行的货币上。然而，他却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一种"不用钱的文明"。

格瓦拉为古巴经济找到的"良方"就是义务劳动。他是古巴全国性义务劳动的倡导者。他相信人的力量，相信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人们能够发挥出各自最大的潜能，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每到周末，格瓦拉都光着上身和妻子到甘蔗田里参加义务劳动，或是到工厂的装配线上帮忙，或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仅1964年一个季度，他个人参加义务劳动达240小时，荣获"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员"的称号。

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格瓦拉极端排斥物质刺激。他曾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依靠物质刺激，犹如向牧羊姑娘推销彩票一样，不会使她眼红，也不会调动其他旁观者的积极性。"

他认为，"在古巴，个人主义必须消失。明天，所有个人应该适当地应用个人主义为社会的绝对利益服务。"他提炼出一个词——"新人"，作为新古巴人的代表，而这个"新人"和他自己划上了等号。

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勒内·杜蒙来帮助古巴渡过社会主义转型。在古巴做了大量调研后，他提出一个方案：允许工人在淡季为维持合作社进行额外劳动，获取报酬，这样可以让他们有共同作主的感觉。

格瓦拉的反应非常激烈。他说，古巴工人需要的不是作主的感觉，而是责任感。他对苏联的工业成功进行了批判，认为苏联人勤奋工作不过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这和搞资本主义的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那不是真正的"新人"。而他本人拒绝在古巴建设第二个美国社会。



格瓦拉浪漫地描绘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成员形象：他们对商业利益不感兴趣，只为社会工作，而不是为了利润工作。杜蒙评价说："切的想法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阶段。"

为了培养这种"新人"，格瓦拉费尽心力。1962 年，劳工部成立了劳动竞赛委员会，还制定了相当于个人档案的"记分卡"。在动员和领袖们的以身作则下，古巴一度出现过红火场面。但很快，一切都回到原有的状态——生产效率低下，劣质产品成堆。

此外，格瓦拉想改变古巴经济面貌的"农业多样化"政策也宣告失败。

1962 年，古巴经济出现大幅度滑坡，作为支柱的甘蔗产量和粮食生产下降。卡斯特罗不得不宣布实行食品配给。民众开始用脚投票，每周平均有 3000 人离开。到当年年中，约有二十万古巴人流亡国外，占全国人口 3％ 。

格瓦拉改造人性的实验失败了。

一些人成为这场"道德改造"的受害者——那些"懒散"的工人被送到遥远的集中营作为惩罚。

献身"世界革命"的战士

1964 年，格瓦拉决定离开古巴。

他不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了。新政权已经稳定下来，经济改革连遭失败，特别是，在对苏态度以及"输出革命"等问题上，他和卡斯特罗的分歧越来越大。

这个曾经的"嬉皮士"似乎并不快乐，身上笼罩着一股阴郁的气息。他已步入中年，是 4 个孩子的父亲，还是一贯的不修边幅，依旧戴着贝雷帽，但已经剪掉了长发。从一张他参加割甘蔗义务劳动的照片看，他的腰部开始有赘肉了。

也许是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年纪：他快 36 岁了，还能行军、打仗、指挥军队，再等几年，就太晚了。

1965 年，一名老商人悄悄离开古巴。他一头光亮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胡子修剪得非常精致，嘴里还装着假牙。17 天后，他出现在与刚果交界的坦桑尼亚。

这位名叫拉蒙·贝尼特斯的商人正是格瓦拉。和他一起到非洲的，是古巴革命时期的追随者。

一年前，格瓦拉作为古巴政府官员出访非洲时，曾秘密会见过金沙萨的起义军。当时刚果领导人向他提出了帮助的请求。然而，在和当地游击队打过交道之后，他感到失望之极—



—这些“自由战士”身上带着各种劣根性，平日里住在宾馆过舒服日子，他们只想跟他要一样东西——“古巴的军事培训和资金援助”。

在刚果搞革命的日子，格瓦拉过得黯淡无光。和之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想象不同，他在那里很少有仗可打，就算有，也只是小型的战斗，还需要当地游击队的批准。他仍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一些事，如给贫苦人治病，开设“文化进修班”。

由于刚果游击队的溃散，他们的游击基地被攻破了，古巴游击队的成绩也乏善可陈。格瓦拉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刚果的真实情况，说他们是如何浪费掉外国援助的，“你可能会认为，我已患上了可怕的不明原因的悲观症。”

11 月底，心力交瘁、疾病缠身的格瓦拉带着古巴游击队撤离了坦格尼克可湖。

离开刚果后，他在古巴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住了数月，埋头写作《革命战争回忆录》，对刚果章节进行修改。他依然不愿意回古巴，妻子阿莱达风尘仆仆赶来和他相会，想说服他回家，最终只能黯然离开。

他的“世界革命”理想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早在 1959 年，一位随格瓦拉出访日本的人员曾记录下他的“全洲革命理想”：他计划在祖国阿根廷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成功后，再把革命推向南美的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最后推向整个拉丁美洲。

1964 年，他支持马塞蒂在阿根廷地区的游击活动。然而，此时的南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阿根廷刚刚完成选举；马塞蒂所带领的游击队也遭到了灭顶之灾，马塞蒂本人牺牲了。此时，阿根廷发动革命的可能性很小。

他把目光投向正处于危机中的玻利维亚——一个军人集团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帕斯·埃斯腾索罗总统的政府。一年前，他派出的女特工、据说也是他最后一任情人——塔尼亚已经在那里开创出一番局面。

前往玻利维亚之前，格瓦拉回到了哈瓦那和家人告别。儿女们默默地和这位前头光秃、戴着黑色宽边眼镜的“拉蒙”舅舅告别。在古巴的最后一晚，他和卡斯特罗共进晚餐。天亮了，卡斯特罗在机场目送他离开。

11 月 7 日，格瓦拉在日记本上记录下他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的情况。这本《玻利维亚日记》后来成为了解格瓦拉这段历史的最权威资料。

游击队员进驻一个叫达卡拉米那的农场，开始组建队伍和基地。不久，秘鲁革命者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和几名玻利维亚人也加入了格瓦拉的队伍。随着人员数目扩大，管理出现了问



题，违纪现象频频出现。格瓦拉和玻利维亚共产党领袖蒙赫为争夺游击队的核心指挥权而发生矛盾。1967 年 1 月 1 日，两人争吵后，蒙赫离去，格瓦拉称，对方“就像到断头台区的人一样”。

农场进进出出的陌生人，引起当地一名农民的注意。他开始窥探这里，随后向当地警方报告了这里的情况。便衣警察搜查了农场，万幸的是，他们没有相信农场有武装人员的说法，搜查之后扬长而去。

险情不断。行军训练中出现了意外伤亡；这支“美洲队伍”内部也不时爆发各种矛盾。格瓦拉的日记里不时有“我累极了”、“我感到极度衰弱”这样的字句。

更为讽刺的是，和他的《游击战争》所阐述的革命哲学不同，当地农民并不想要“革命”，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政府通风报信。政府派出的巡逻队一路追踪到游击队大本营，抓获了几名逃跑的玻利维亚游击队成员，从他们的口供里确信：格瓦拉就在农场。警察随后再次对农场进行突击搜查，侦察机也在基地上空盘旋。

随后，游击队员德布雷和布斯托斯被捕。在威逼下，布斯托斯画出了格瓦拉的画像。一直在追寻格瓦拉下落的美国中情局也赶到。一场更大规模的围剿开始。

10 月 8 日，游击队被一支数百人的政府军包围了。经过一番激战，队伍被打散。

当一名印第安政府军士跳出隐蔽处，瞄准一名没有武器的游击队员，对方突然喊道：“别开枪，我是格瓦拉，对你来说，我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上尉普拉多走过来，看到他后兴奋得差点晕过去。

接到格瓦拉被捕的报告后，玻利维亚政府第八师军长和美国中情局特工坐着直升机赶到了现场，特工罗德里格斯一眼认出了格瓦拉。他为格瓦拉拍了一组 3 张照片。照片上的格瓦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表情严肃又茫然，像是在寻找答案，又没有找到。

关于格瓦拉的死和遗言，经历现场的当事者在各自的回忆中给了不同的版本。

10 月 9 日，切·格瓦拉被处决，年仅 39 岁。

他的尸体在当地医院后院的洗衣房被示众。摄影师弗雷迪·阿尔波特记录了他的死状：他的头微微抬起，眼睛微睁，表情纯洁无邪，看起来仿佛还活着，犹如受难的耶稣基督。

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没想到把他的形象拍成上帝基督那样的救世场面，我只拍了当时的气氛。不过，在格瓦拉的遗体周围，确实有一种神圣和圣洁的气氛。”

这种说法在医院的修女、清洗尸体的护士和当地妇女之间流传着，她们偷偷剪下他的头发，以祈求好运。



虚幻的完美

死亡的主题，反复出现在格瓦拉生前的日记、诗歌和信件里。

25 岁时，他留下一篇关于命运启示的《页边笔记》，文字激烈、神秘，充满着戏剧性的悲伤。他记录了在一个漫天繁星的寒冷夜晚，他被浓重的黑暗包围，一个神秘的人和他在一起。他们进行了交谈，神秘人对他的死做出了预言：

“你死的时候会紧握拳头、牙关紧咬，充分表现出你的仇恨和抗争，因为你不是一个象征，你是正在崩溃的社会中真实的一员……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关于他的死，还流传着更多稀奇古怪的神话。

传记作家安德森记录下了一串长长的名单——许多和他的死有关的人都遭遇暴毙。第一个死的是玻利维亚军政府总统巴里恩托斯，1969 年他乘坐的直升飞机由于不明原因坠机；出卖了游击队的农民罗亚斯 1969 年被“第二”民族解放军处决；采集切指纹的军官金塔尼亚上校在德国被谋杀……

这一串长长的暴毙名单，让人不由得相信：所谓“切的诅咒”是真实存在着的。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格瓦拉在死后的“圣化”与偶像化呢？

“有时，一个人的死亡悲剧使他的一生更加完美，并使之成为人间楷模。”英国评论家约翰·伯格说。格瓦拉年纪轻轻时候就死掉了，却因此代表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

胜利是暂时的、片面的、需要做出妥协的，而失败和死亡则是彻底的、永恒的。胜利是世俗的，失败是神圣的。

切的社会理想、努力和改造社会的实验一一宣告失败。更讽刺的是，他和他曾追随的领袖、战友一手缔造的理想国度，成为诠释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的一个现实版本。

正如神秘人对他说的那句充满玄机的预言——“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虚幻的圣徒被莫名地崇拜，肆意地消费，他的灵魂却寻找不到一个永恒的世界。

他的国不在这地上，当然，也不在天上。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2 胡泳：格瓦拉神话背后的黑色真相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切身上存在着革命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宣称自己对一个叫做“人民”的模糊的东西有无限的热爱，但对个人、尤其是反对自己信念的个人毫不留情。这也就是德伯里所说的，“切爱人类，但厌恶人。”**

2007年10月，是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就义40周年。可以想见，会有很多的纪念、致敬，也不会缺少商业上的促销，或许，真正欠缺的是一点严肃的反思。40年来，切·格瓦拉成了一个性偶像，英雄的受难者，革命时尚的终极招贴男人。然而，在他神话的背后，隐藏着黑色的真相。

在格瓦拉参与建立的新古巴，现在哈瓦那到处都是切·格瓦拉的头像，却看不到卡斯特罗。卡斯特罗说：“你不会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雕像，不会有一个学校，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小镇以我的名字命名，不会有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我们并不是要教会我们的人民去相信什么，而是要教会他们去思考，去推断。”

如果古巴人民乃至后来全世界的左派真的学会了思考，他们不应该有一丝一毫崇拜切·格瓦拉之处。他在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的岗位上，表现得缺乏现实态度。然而他却认为那些有目共睹的挫折和失败不是经济社会主义化的结果，而是缺乏革命警惕性的结果。当他离开哈瓦那的时候，曾给卡斯特罗留过一封信。信中的话充分表明他是个走极端的人：“革命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他的战友们经常说：“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伟大的使命，一种传道士的使命。”但他们有意隐瞒这一事实：他骨子里是个头脑发热的人，幸而缺乏实际观念。假如他独自掌权的话，要造成许多灾难，会给许多人带来不幸。他因为与卡斯特罗意见分歧而不得不退出舞台。

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有着让世人费解的关系。曾经和切以及卡斯特罗有过密切交往的法国教授瑞吉斯·德伯里说：“历史对卡斯特罗很苛刻。它在力捧切的同时贬低了卡斯特罗。”



无论切有多么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切·格瓦拉是一个铁定不会按牌理出牌的人。

在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切·格瓦拉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暴露无遗。他比卡斯特罗甚至赫鲁晓夫都更加张狂，似乎根本不顾忌全世界在那一刻屏住呼吸的紧张。他对伦敦《工人日报》说："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我们必须让仇恨活在心里，并促使它爆发出来。"

无论切·格瓦拉的性格中有多少自相矛盾之处，这样的想法是走得太远了。你无法同时成为一个解放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和一个迫切想要按下核按钮的人。它显示了切的冷血，这是他的偶像身份后不为人所注意的一面。如果你读过切·格瓦拉的政治著述，可以在其中发现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和纯粹的、不加掩饰的仇恨，有些时候达到病态的程度。

他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

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之下，难怪切·格瓦拉会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反对革命的人大开杀戒，以不合法律程序的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社会的人"。他也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怕弄脏了自己的手的人。

不是列宁，是列农

切·格瓦拉的冷血在青年时代就显现出来。在《摩托车日记》（TheMotorcycleDiaries）中，在描述了他在拉丁美洲旅行到处看到的剥削与贫穷之后，切·格瓦拉写道："我感到我的鼻孔张大了，嗅到了弹药和敌人倒地的鲜血的辛辣味道。"

然而，就是根据这一日记，2004 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切在其中被扮成了"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他身上具有的波西米亚气质使他非常具备时尚潜力。影片的制片人保罗·韦伯斯特说："切很自然地融入了 50 和 60 年代的到处浪游的生活方式，披头士引发的那种四处活动和冒险的感觉。"

切年轻而帅气，这一点和以后发生的故事，构成了神话。保罗·纽曼曾说，"'如果我生下来就是褐色的眼睛，我不会成为一名影星。'如果切不是生得这么好看，他不会成为一个神话般的革命者。"

所以，毫不偶然，切·格瓦拉那张广为流传的肖像照是一位时尚摄影师科尔达拍摄的。安德森在切·格瓦拉的传记中描述说："在镜头中看到切，科尔达在聚焦之后，被切脸上的表情所震惊。它是那种绝对的难以抚平的情感。他按下了快门，照片随即传遍了全世界，成为最负盛名的招贴，装饰了无法计数的大学生宿舍。在照片上，切像是一个终极的革命



偶像，他的眼睛大胆地直视未来，他的表情充满了男人气概，写尽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这个肖像很快印到了T恤衫、明信片、棒球帽上，进入了安迪·沃霍尔的流行艺术，被麦当娜易装印在《美国生活》的大碟上。

1967年，切死去的同一年，法国的激进主义活动家居伊·德波出版了《奇观社会》，惊人地预测了我们今日对名人和奇观的沉迷。“所有一度直接存在的，”他写道，“都变成了仅仅是再现。”

还有什么比切的命运变迁更能说明这一点？在他去世40年之后，切·格瓦拉被用来出售从牛仔裤到罐装啤酒的各种商品。甚至有一种洗衣粉被冠以“切·格瓦拉牌”，它的口号是“切可以洗得更白”。切完成了一个由暴力革命的象征到时尚酷哥的转变，他现在是一个全球品牌。

另一部切的传记的作者乔治·卡斯坦达说，“吊诡的是，切的生活被倒空了他原本想拥有的意义。不论左派怎么想，他早就失去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榜样的作用。”比起列宁来，切更像是列农。

要想成为一位浪漫偶像，一个人不仅要在生命的华年死去，而且要在死时满怀绝望。切完美地符合这两条标准。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这样总结切·格瓦拉的神话：“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败得到了保证。他的故事充满失败和孤独，这是它如此诱人的原因。如果他还活着，他的神话早就烟消云散了。”

爱人类，但厌恶人

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本来有机会界定未来的理想秩序。然而，他把古巴的经济管理得一塌糊涂。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切·格瓦拉的招术是去除一切市场机制，实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把道德动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所有这一切，都置古巴的实情于不顾。他的世界观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宣称“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1960年3月，他说：“想到个人是一种罪恶，因为个人的需要在人类群体的需要面前变得不值一文。”

切对集体主义有着斯巴达式的观点，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由无私奉献的革命者领导的平等社会，其中没有民主的位置，没有个性特征，也没有物质的丰富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道德动机在切的社会和政治愿景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集体的无私、牺牲和奉献在他的眼里胜过理性个人的政治自觉与独立头脑，他从不相信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多数统治。



这就是切，他对自己的信念无比忠诚，但这种忠诚使他的信念成为僵化的教条。他身上存在着革命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宣称自己对一个叫做“人民”的模糊的东西有无限的热爱，但对个人、尤其是反对自己信念的个人毫不留情。这也就是德伯里所说的，“切爱人类，但厌恶人。”切的政治美学使他对普通人的物质需求和切身利益采取漠不关心甚至敌视的态度。

今天，历史的记录已经无比清晰：格瓦拉主义同建立一个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的努力是不相容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普通人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毋需依赖“善良的救世主”。

现代的罗伯斯庇尔

切之所以成为切，也和他的身体有关。幼年由于母亲的疏忽而使他得了哮喘，这种慢性病长期折磨他直到死亡为止。与哮喘的斗争造就了他的性格。从小他就习惯于以顽强的意志抵抗和克服一种可怕的疾病，所以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没有意志不能击败的东西，哪怕要打击的目标是美国或全球资本主义也罢。从某一点上来说，这既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心理学家们则从心理上剖析切。在《病夫治国》一书中，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朗契尼克写道：“切·格瓦拉逃避他作为部长的责任，抛弃了他的所谓领袖的假面和他新获得的古巴国籍，为了重新穿上破烂的军服而把家庭交给国家照管，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现实。他没有办法面对生存的困难，便宁愿绕过这些困难。这难道不是又一个类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是英雄，还是反英雄，假英雄？他是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冒险主义者，理论家，罗伯斯庇尔类型的有宗教幻象的人，一个内向的人，一个强迫症患者，用卡斯特罗的话说，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攻击性，正是这一点使他采取自杀性行为。没有人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平。而他所进行的狂热斗争，只是不乏用另外一些不平的制度来取代这些不平！”

两位作者说，很久以来，纳赛尔就把格瓦拉视作一个厚颜无耻的人，认为他“思想残暴、嗜血成性”。例如，切曾对他说，“衡量社会变革的深刻性是要看它所触及的人数，使多少人失去了在新社会的位置”，纳赛尔回答说：“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消灭某一阶级的特权，但并不是消灭属于这个阶级的人。”

纳赛尔最后给他上了一堂意味深长的革命课。他说：仅仅成功地发动民众是不够的，随之而来的是应该和民众结合，像结婚一样，让他们挣钱，建造工厂和开垦土地。格瓦拉颇为不快地说道：“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纳赛尔针锋相对地说：“一名外科大夫把他的病



人放在手术台上，麻醉之后打开他的肚子，却拒绝把手术继续下去，您对此有何想法？您当过医生，您不能做这种事。”然而，切已经对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洛桑医学院的格劳尔教授，注意到他的性格组成很特殊：“自我身份障碍——职业革命家无祖国，无居住地，无家庭——一种如此与众不同的身份，经常是和恋己癖联系在一起的。握有一种伟大的真理，把这种真理的实现视为唯一的准则，这种狂热，可以是某些人的一种出路，但这种出路，始终受着潜意识中的妄想性自大狂和抑郁症变幻不定的矛盾的威胁。类精神分裂症这个词或许对格瓦拉不合适，因为至少他在战斗过程中曾表现出一些人所具有的品德，认识他的人经常提到他的这些品德，诸如不容置疑的勇敢，生活艰苦，绝对无私（罗伯斯庇尔就喜欢被叫做‘不受腐蚀的人’）。”

如瑞吉斯·德伯里所说，切·格瓦拉成了一个“到处流浪的没有群众的悲剧英雄”。就精神而言，他属于那些流浪的冒险家一类，他们无法重建他们所摧毁的东西。

（文章来源：《看历史》）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析】

8-3 张铁志：格瓦拉最迷人的部分



张铁志：台湾文化与政治评论人，现担任香港《号外》杂志主编。

> “在哈瓦那，格瓦拉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观光商品，泛滥到让人几乎反胃。如果我们对于卡斯特罗的矛盾情结是，他是一个后来成为强权政治的革命者；那么对于格瓦拉的矛盾情结则是，他是一个后来成为商品化偶像的革命者。”

（编者按：在哈瓦那，格瓦拉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观光商品，泛滥到让人几乎反胃。如果我们对于卡斯特罗的矛盾情结是，他是一个后来成为强权政治的革命者；那么对于格瓦拉的矛盾情结则是，他是一个后来成为商品化偶像的革命者。）

应该是在1990年代前期的大学时期，我读到了格瓦拉。彼时终日搞读书会、上街头抗议、在学校发传单，手持麦克风在人群面前演讲。除了专注于当下的台湾社会矛盾，我也很着迷历史上的青年革命。然后，不记得在什么书上，读到了格瓦拉的故事。那样典型的革命者的故事，决绝的姿态，结合了勇气与悲剧，献身与牺牲。在那个我们正急切于寻找反抗典范的过程中，他当然成为了无可取代的典型。“一个真实的革命者是被伟大的爱所指引”，这是格瓦拉一句最让我喜欢的话。他的革命是爱憎分明的革命。但应该是以爱，对于被压迫者的爱，对正义、和平等价值的爱为底蕴，然后才会出现对那些压迫与支配者的恨。所以爱是指引。

回首历史，太多的革命者以正义之名出现，但最后都转变为一副丑恶的面孔。尤其作为一个革命者，是处在高密度思想和肉体斗争的处境之中，他的爱与善很难在与恶的斗争过程中不被一步步侵蚀。于是，许多革命者最初的对人民的爱，到后来轻易地就沦为对权力的爱了。

这就是格瓦拉最迷人的部分。或许因为他是医生，所以可以保持那样的爱，如同我们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和《玻利维亚日记》中所看到的，对同胞与同志的爱。



有人说，他掌权以后也镇压过异己。这个为了权威与纪律而镇压异己的问题，的确是革命者普遍的内在问题；上世纪60年代学运后衍生出的许多激进革命团体，如日本赤军连也是如此。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而且即使他也如此做了，那也主要是因为他把革命理念纯粹化，而非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事实上，格瓦拉对于权力所采取的立场也正是他被人尊敬的原因所在。1959年后，他看到了当年的同志正日益庸俗化和堕落，看到了革命终将被官僚体制所吞噬，并逐渐自我背叛化，所以他选择了放弃权力，继续上路去革命。

正如沙特和许多曾经支持卡斯特罗的左派们，对于卡斯特罗的日益强权，而在1971年的公开批判信的最后所说的那样，“我们重申，我们与当时指引着山中游击斗争的原则站在一起，而这个原则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曾一再以言语和行动所展现出的。”

那么，格瓦拉的游击斗争如今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他对社会不平等、对弱势的关切是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当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中，这个阶级矛盾的问题从来没有消失。只是，随着过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国之内的社会不平等增加了，且非洲大陆、南亚等地区人民的贫穷并未改变。改造资本主义的迫切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过。而且，这个斗争不是正在进行吗？从1999年西雅图反WTO的抗争，左翼、环保主义、青年无政府主义者们，他们许多人身上穿着格瓦拉的T恤，秉持着他的火炬，用身体去抵挡新自由主义的暴力巨轮。

这些格瓦拉的子民们在某程度上是取得了成就的：血汗工厂减少了，世界贸易谈判的议程转变了（更强调第三世界的发展，虽然还在谈判中），公平贸易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当然，斗争还是要继续下去。

第二，他的游击战也让我们联想到对文化的游击战。面对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除了与其正面对抗，除了用街头的公民不服从取代格瓦拉的山中武装游击战，也有必要展开文化的游击战。透过各种文化的形式，音乐、诗歌、剧场等，去暴露体制的暴力与压迫，去展现抵抗的可能。

然而今天，格瓦拉现象已经是个流行文化现象了，尤其好莱坞又有了新的传记电影上演，必然卷起了一股格瓦拉的热潮。但这也正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格瓦拉现象的核心矛盾：格瓦拉的商业化，以及革命的庸俗化。

我们该如何看待他无所不在的头像？尤其是各种商品上的英俊头像？那些，可以让新时代更理解格瓦拉所代表的革命精神吗？



格瓦拉的商品化现象在古巴也一样。如今在哈瓦那，格瓦拉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观光商品，泛滥到让人几乎反胃。如果我们对于卡斯特罗的矛盾情结是，他是一个后来成为强权政治的革命者；对于格瓦拉的矛盾情结则是，他是一个后来成为商品化偶像的革命者。

但我想，人们总是需要令人感动的故事。格瓦拉成为一个大众的英雄并不是坏事。毕竟，还是有许多真正的反抗青年把他的头像穿在身上。他们并没有忘记他的真正精神。而且，幸好他的形象不属于某企业的智慧财产权，而是可以被不断复制、再造。你可以在任何国家的地摊和夜市看到他。这不也是一种对当前资本主义私有财产逻辑的颠覆？

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介入对于格瓦拉的诠释权，如何让他不只是商业机器的摇钱树，而是在他已然被大众化、流行化的既有事实下，去让那些只以为这个头像很酷的年轻人，对于格瓦拉、对于左翼历史、对于格瓦拉的精神在现实的实践，有更多的理解。

此刻，那些不正义的压迫制度仍然强大，且全球资本更会流窜，并以更细致、更多样的面貌展现。而我相信，不论是文字、思想或是街头活动的各种形式，都会是同样重要的形式。这就是格瓦拉之于我们的火炬吧。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4 吴琦：黄纪苏谈切•格瓦拉：他代表了人群中20%的理想主义者



吴琦：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理想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总不能放弃尝试更好的东西。波尔布特、斯大林是不对，但现今一切就对吗？就彻底放弃理想主义吗？这是格瓦拉的意义之一。”

黄纪苏，社会学家，目前供职于中国社科院，话剧《切•格瓦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编剧

人物周刊：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谈论切•格瓦拉有何意义？

黄纪苏：在一个商品社会谈切•格瓦拉是不太容易的，因为谈着谈着就容易成为商品化的一部分。他是一个要武装革命的人，既然今天不能武装革命，那他的意义在哪儿？一个没打算要武装革命的人，却要宣传他，你是要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对他的认识就是一个美男子，眼神很忧伤，很性感，特别酷。如果对他的认识仅止于此，那没有必要说他。我们可以解读他，但不能随便解读他，他身上也有一些抗解读的地方。毕竟，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人类从茹毛饮血发展至今，就是一个理想不断变成现实的过程，我们今天毕竟不那么野蛮了，下大雨还有人愿意开着私家车出来救人，如果真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世界不会是今天这样。人类社会有20%的理想主义者就行了，或者百分之十几也没关系，格拉瓦就代表了这一部分，很极致地、纯洁地、晶莹地代表了这一部分。

人物周刊：但他代表的左翼革命的确失败了。

黄纪苏：之前的社会主义试验的确都失败了，我在剧中也写过一句台词，谁还为新世界打包票，新世界已经崩盘了。但我想说的是，人类的理想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总不能放弃尝试更好的东西。波尔波特、斯大林是不对，但现今的一切就对了吗？就彻底放弃理想主义吗？这是格瓦拉的意义之一。



另外，理想主义也不全对，革命以后干不好也不行，不能想着当新皇帝。杨尚昆的日记里就写过，1949年以后有些干部追求享受、奢华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这种理想主义就是瞎扯，和农民起义一样，都面临着堕落、变质。实际上每个人、每个制度都面临考验。

人物周刊：在腐败这个问题上，切•格瓦拉似乎也有标杆的意义。

黄纪苏：对，所以我说可以解读他，但不能随便解读。切•格瓦拉自觉性比较高，他很警惕自己会变成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僚，所以当了古巴第三号人物之后，还能够辞了官去当一个普通游击战士。法国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曾经参加过切的游击队，他说当时每人一份干粮，过河的时候，切的干粮掉在水里，他就自己饿一天，红军长征都做不到这一点。

人物周刊：除了精神上的感召，切•格瓦拉是否还能提供行动上的力量？

黄纪苏：冯友兰在谈中国古代哲学的时候，说到一个"抽象继承法"，比如我们谈到岳飞谈起屈原，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什么东西，肯定不是抗金，也未必要站在楚国的立场，而是一种抽象化了的爱国主义，那种为了集体献出生命、有所担待的精神。这个是我们今天谈格瓦拉的时候要注意的。其实当时中国都批判他是游击中心主义，具体来说，他做的好多事情是走不通的，也不一定对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另外的形式里寄托这种精神，比如更有善心，更有公意，把这种精神分散到生活的细节里，把政治变成更广泛的生活，不然就只能是空说。比如学者，现在有些大学的管理学教授每年收入粗算能有上千万，这就是借助腐朽的国家体制和政府，利用各种科研基金，从人民那里骗来的钱，你看现在还有几个学者愿意骑自行车的？都嫌丢人。我有个朋友研究中国水系治理，屋里三千多张等高线地图，眼睛都看瞎了，他没有去跟那些时髦，买房子、出国，能够反其道而行之。这难道不是一种格瓦拉精神？

人物周刊：这是在个人的意义上，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呢？

黄纪苏：我们当然希望更多地改变社会结构，改变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改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但是也不妨碍我们每个人都首先成为一个好人。不必拘泥于要组织政党，上山打游击，也不必说要成为格瓦拉，哪怕只是在人生的某一个路口、某些瞬间能有一些善念，能够种一点善因，让这个社会一点一点积累，不追求一蹴而就。也许这些好人在政治立场上并不认同格瓦拉，但在价值观上，在抽象继承的意义上，他们的身上都有格瓦拉的影子。

结构不能调整，但允许社会流动，这是我们今天的世界观。我不认为以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搞得多好，不认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做好了，但是他们提



出的问题是对的，这个不平等的等级社会需要改变，人类应该向更好的方向去，叫什么主义没关系。格瓦拉就代表了这种挑战，敢于挑战规律，挑战人的本性，挑战垮塌的现实。

人物周刊：萨特说切•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他是否被我们完美化甚至神化了？

黄纪苏：肯定有。看他的传记里写，当他被卡斯特罗提拔的时候，他也得意。人都是不断成长、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是他的确比一般人更纯粹，也有一些幼稚的地方，这也让他更容易具有符号的力量。这就涉及到义利关系，究竟什么是成，什么是败，不是看谁有多少武器多少金钱，不是看谁屠杀了多少生命收买了多少灵魂，而是看谁的精神能将人心点燃，被歌声流传，把历史照亮。其实胡志明、毛泽东都是那场革命中出类拔萃的人，但是切•格瓦拉更纯粹，也许也是因为他没有成功，命运成全了他。作为价值观的英雄，作为符号的力量，他在现实的世界倒掉了，在精神的世界站起来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左翼运动总是依靠这类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领袖来进行动员？

黄纪苏：理想首先不是现实，不是现实但要改变现实，这种力量从哪里来？往往就从个人牺牲开始。不像现在是我给你钱，你帮我干活。在你拿不出钱来的时候，只能靠人格、道义和牺牲来赶超人家，因为没有别的力量。

另外就是现代政治与前现代政治的区别，政治经济的先发国家有基础进行民主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大众受教育程度较高，社会差距不太大，可以在理性判断的前提下进行社会辩论。但在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的苦难社会里面，会形成另外一种改造社会的传统——依靠神迹。这种传统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佛陀、耶稣，老百姓一听就信了，一直到毛泽东、切•格瓦拉都是这样，政治动员非常管用。当然我认为这种传统应该慢慢消失，不具有未来，但回过头去看，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考虑当时的历史情境，有同情式的理解。就格瓦拉来说，他比其他人更纯粹，尽管这并不代表他就是基督教圣徒，但相对来说，他已经非常不易——写一件事容易，说一件事容易，演一件事情容易，做一件事最难。

人物周刊：切有关世界革命的理念是否已经过时？

黄纪苏：我们那个时代还不太好谈，90年代一切都在接轨，经济政策、学术规范、会计制度都在改。但是今天要不要接轨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轨道的另一端，2008年之后的西方金融危机十分深重。我们不一定要谈世界革命，这个概念已经听伤了，也许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的变革，这是今天来看，是一个合理的诉求。全球化把世界变成了一条跑道，谁跑慢了谁出局，所以解决方案一定是世界范围内的变革，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对平等。从这个意义来说，格瓦拉的世界革命的理念是有深刻道理的。革命都是逼出来的，现在谈革命都说是一个骗子领一帮傻子，其实不是，总是既得利益者造成了革命的



前提，首先别把穷人往毛泽东、格瓦拉那边赶。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追问，今天的社会公平吗？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拓展阅读：

话剧《切•格瓦拉》台词精选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6/32/20001016/273814.html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5 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14）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 **是谁，凭什么，让你，切•格瓦拉，一个肉身凡胎的家伙摇身成为圣人，可以如此这般用祈使句的语气告诉我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也许在反抗富人对穷人的压迫之前，首先要反抗的就是这样的话语权力和道德理想。**

掐死一切意识形态大臭虫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上演《臭虫》和《切•格瓦拉》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文化行动，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终于在这个红色世纪的最后一个红色首都以话剧的形式给出了交代，尽管这样的交代语焉不详、欲语还休，尽管这样的交代在那些没有阶级斗争经验、没有意识形态情结的红男绿女眼里，不过是一次节日的狂欢，一场昂贵但高雅的、布尔乔亚式的文化消费。

在某种意义上说，《切•格瓦拉》与《臭虫》的第一部构成了正相反对的呼应。《切•格瓦拉》争论的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这是一个问题；《臭虫》第一部阐明的是：问题恰恰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才出现。乍一看来，《臭虫》的立意似乎明显要比《切•格瓦拉》来得高。因为《切•格瓦拉》表现的是立场，而《臭虫》追问的是问题。不过在一个普遍怀疑和反讽的年代，有时候坚持立场要比怀疑本身更加有力和值得尊敬。在孟京辉的话剧技巧中，反讽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讨好观众最为百试不爽的一种手法，如此昭然若揭的功利主义态度理应遭到唾弃。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赞同《切•格瓦拉》的立场，事实上《切•格瓦拉》的陈述颇有些“最后的莫希干人”的悲壮，它的力量更多地源于激情而非理性。《切•格瓦拉》的煽情带有强烈的不容置疑的口气，整个剧场飞舞的都是无产阶级铿锵有力坚定不移的调调，三个满口正义、良心、真理和革命的男人拄着木棍砸地板，目光迷惘的时候就倾听来自剧场后边格瓦拉的声音，可是那个从扬声器中传出来的带有电磁噪音的“彼岸的声音”总让我产生纯生理的反应：是谁，凭什么，让你，切•格瓦拉，一个肉身凡胎的家伙摇身成为圣人，成为所谓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可以如此这般用祈使句的语气告诉我应该这样，不应该

那样？！这种“文革”大字报式的话语暴力时常让我想起那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许在反抗富人对穷人的压迫之前，首先要反抗的就是这样的话语权力和道德理想。

《臭虫》第二部在形式上远不如第一部精致，孟京辉和马雅可夫斯基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但是比较而言我却更加喜欢《臭虫》的第二部。第一部注重的是形式的张扬，而第二部则是思想的实验。孟京辉在《臭虫》第一部中对苏联抹杀个性的集体主义的批判颇有些落井下石的味道，其言辞凿凿与《切•格瓦拉》鼓吹革命的不遗余力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而在《臭虫》第二部孟京辉终于有了艰难的自由表达，不再拘泥于左与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纠缠，这一点甚是难得，我们的先锋导演总算不再和过去较劲了，尽管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向前究竟看到了什么。

《臭虫》第二部和革命无关，既没有欢呼革命也没有告别革命，也许在孟京辉眼中这个时代终将以闹剧收场。《切•格瓦拉》的结论铿锵有力：只有革命才是不朽的——历史决定论者永远坚信历史将终结在何处。

尽管我坚决地反对血统论和出身论，但是我的确相信这两部戏之所以南辕北辙与张广天和孟京辉截然不同的出身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一个是行吟诗人流浪歌手，一个是学院派的先锋导演时尚先生。

非常凑巧的是，在看《切•格瓦拉》的时候，恰好秦晖——那个关注底层农民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就坐在我的前边，所以我有幸得以观察他的反应。根据我的观察，整部戏中有两个场景秦晖最投入：一个是说现今北京知识界正在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题目叫做“告别革命”；另一个场景是在资产阶级小姐高喊“这个时代的最强音：www.com”以及“最弱音：傻逼呵呵革命啦”的时候，这个强调公平和正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心地左顾右盼，但是我明明看到在退场的时候他摇了摇头，尽管这无碍于他鼓掌以示礼貌，也无碍于我鼓掌以示教养。

（文章写于 2000 年）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鉴】

8-6 羽戈：阿连德与聂鲁达

羽戈：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百年孤影》、《酒罢问君三语》等。

“阿连德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操之过急的改革，伤害了他所能伤害的所有人。政治上，他使用专制化的手段推行民主的观念。经济上，国有化政策导致国进民退；平抑物价、严控商品等只能医一时之痛，却埋下了无穷的后患。”

聂鲁达与阿连德

1973 年，两个智利人的死亡裂开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伤口。

9 月 11 日，总统阿连德死，死因不明。

12 天后，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死，死因同样不明，一说病逝，一说他杀。

聂鲁达在智利文学史上的地位，大约相当于鲁迅在中国。而他对政治之河的涉入程度，则远过于鲁迅。冷眼红尘的鲁迅只是隔岸观火，偶尔湿一下鞋；聂鲁达则积极多了，他投身民主运动，加入智利共产党，参选议员，因反对被右翼极端分子控制的智利政府而遭驱逐，到苏联捧斯大林的臭脚——他至死仍在歌颂斯大林：“我的立场是，在我所不了解的斯大林时代的阴云之上，我的眼前出现了头等人物斯大林，他有原则而善良，像隐士一样简朴，是苏联革命的伟大捍卫者。另外，这位大胡子的人在战争中变得巨大了，他的名字被人们挂在嘴边。”（《我曾历尽沧桑——聂鲁达回忆录》）

因为同属左翼，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据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聂鲁达乃是阿连德最好的朋友之一。1969 年，共产党提名聂鲁达为总统候选人，他却主动退出竞选，转而支持同一阵线的阿连德。1970 年，阿连德当选总统后，任命聂鲁达为智利驻法国大使，算是酬答。朋友加战友，捆绑了两个人的政治命运。



阿连德比聂鲁达小4岁。论出身，倒是聂鲁达更根正苗红，其父是铁路工人，阿连德则出自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他的专业是医学，1933年，毕业于智利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鲁迅弃医从文，是为了医治国民性；青年阿连德弃医从政，是不是立志医治整个国家？他加入社会党，很快取得该党的领导权。1952年、1958年、1964年，他三次竞选总统，皆告失利。他开玩笑说，自己的墓志铭应该这么写："下一任智利总统长眠在此"。

说这句话的阿连德像一个悲情的先知，他早早预见了自己的悲剧未来：纵然他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据说，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通过合法化的选举程序而成为总统，阿连德是第一人），却暴死在总统任上。也许，还不如永远做"下一个"。

1970年，智利总统大选，阿连德所在的社会党联合共产党和激进党，组成"人民团结阵线"，联袂出击，斩获了36.2%的选票，美国政府支持的保守派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获34.9%，政治色彩居于二者之间的基督教民主党（代表中产阶级）所推举的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Radomiro Tomic）获27.8%。阿连德以微弱优势领先，可所获选票未达半数，依智利宪法，还需进行一轮选举，由议会从阿连德与亚历山德里这一组老对手当中选一人作为总统。势力均衡的双雄相争，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此刻，基督教民主党的态度就十分关键，身为第三大党，它在议会有足够多的席位决定总统权杖的归属。最终，该党选择阿连德，然而秘密约定了前置条件，即阿连德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得破坏智利宪法的任何条文，"保证民主"使军队非政治化，政府不得没收新闻媒体等。可见，即便暂时结成了同盟，基督教民主党对一向左倾、激进的阿连德依然不太放心，所以强加了这一道政治紧箍咒。

可惜，这道紧箍咒只能禁锢阿连德，却无法禁锢智利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暴风骤雨。当山雨欲来，一波接一波的惊天剧变，早已挣脱了阿连德政府的改革之手。阿连德不仅未能当成时代的推手，反倒被时代的车轮碾作了红色的尘土。

就像中国改革号称"中国特色"，阿连德宣称，他施行的政策乃是走"智利社会主义之路"。其改革的关键词，也许老一辈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工业国有化、土地改革、重建分配体制。其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铜矿和银行等重头项目收归国有并无不可，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对原持有者的补偿公正与否的问题。智利有不少矿业公司，皆由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所投资。阿连德政府经过核算，认为这些外国资本家多年以来从智利所赚的利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投入，权衡之下，他们还欠智利人民的钱呢，于是，一律不予补偿。这一招，严重得罪了国际经济市场。一两年后，国际铜价持续走低，从1970年高峰时期的66美元/吨下降至48-49美元/吨，因智利经济属外向型，其GDP中40%依赖出



口，且它是世界第一铜出口国，比重之大，关系国脉民命。被国际市场的经济与政治巨鳄（很可能，其后黑手是美国佬）这么一报复，智利经济便乱了阵脚。

再说土改。智利的土地改革，自阿连德的上一任，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执政期间就已经展开。弗雷竞选总统之时，曾经许诺，要让10万农民拥有土地。当选后，前三年（1965-1967年），平均每年没收45万公顷土地；后三年（1968-1970年），则达71.8万公顷。依此走势，稳步推行，前人种树，后人正好乘凉。阿连德政府却要搞大跃进，好似三年赶英超美，一举翻天覆地，仅在1971年，执政府所没收的土地比弗雷政府六年之总和还要多。最可怕的是，没收地产主的土地，本应由土地改革协会领导进行，殊不知事态迅速恶化，一发而不可收拾，农民翻身做主人，往往自行决定怎样没收土地。对此，政治旗号便是为工农服务的阿连德政府怎么可能干预呢，只能默许。这下地主不干了，便组织武装保卫自家的土地庄园。土改改到最后，沦为农民及农业工人与地主之间的武力冲突，政府束手无策，局势完全失控。

“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1971年1月17日，一次公开讲话，阿连德如是说。此言严重不合时宜，只适合憋在肚子里。那么，阿连德是哪些人的总统呢？首先是工人们。他履任之初，便将所有工人的工资增加了35-40%，其中一部分是为了补偿此前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为了防止物价随之上涨，阿连德政府干脆冻结了物价。如此必然打乱供需关系，物价不往上涨，生产商利润大减，哪有心思投入生产呢；同时，老百姓腰包鼓胀，消费欲亦将激增，可日渐干瘪、匮乏的市场无法满足他们充盈的欲望，怎么办？黑市遂告形成。这则不是阿连德政府——乃至任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市面。然而，他们绞尽脑汁所推出的商品分配制度却无法对付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信任危机。从改革一开始，改革者在智利的病体之上所注射的药物，便同步化作病毒。

在阿连德任期的第一年，基于一系列短视的铁腕政策所生出的奇效，智利经济形势十分喜人。失业率降到历史最低的3.8%，通货膨胀率下降到20%以下，GDP增长率为8.6%，其中工业增长率达12%。可到了1972年，政治近视眼们便尝到了苦果的怪味。冻结物价政策导致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面粉等价格飞涨，此年8月，短短一个月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就从190埃斯库多上涨到421埃斯库多（注，智利于1960年1月1日发行新货币埃斯库多，1975年9月29日收回，此后不再流通），涨幅为120%。再加上政府财政赤字，以至通货膨胀率从1971年的21%增加到140%，至1973年9月，阿连德政府崩盘前夕，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81%。而且，在物价飞涨的另一面，是工人的收入如老牛破车，停滞不前。1973年春天，世界最大的地下铜矿——埃尔特尼恩特铜矿的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阿连德则回应说，矿山已经国有化，工人乃是矿山的主人，不该要求加薪。然而，矿工们要具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才能认同这一点呢？认识不到，只能继续罢工。当阿连德政府失去



了它的老家底，工人阶级的支持——更不用提反对党的虎视眈眈和国际敌人的兴妖作怪——它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

不妨说，阿连德操之过急的改革，伤害了他所能伤害的所有人。他根本不懂什么叫统一战线，过分激进的决策，逼迫基督教民主党这样的中间党派，曾经的同盟者，一步步右倾化，直到与右翼的国家党结成联盟。从政治上讲，尽管打出了民主的旗帜，他却是使用专制化的手段推行民主的观念，这般强行嫁接，最终能结出什么样的政治好果子呢。从经济上讲，国有化政策显失公正，导致国进民退；平抑物价、严控商品等过于短视，只能医一时之痛，却埋下了无穷的后患。一言以蔽之，阿连德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

从1972年起，智利就乱象频生，等到1973年9月，全国性大罢工持续不断，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留言漫天飞舞，据说连议会都参与其中，授意军队出面恢复宪政。当一个国家风雨飘摇，依照南美洲军人干政的传统——相对而言，智利所受军政之害要轻于其他国家——军人不出，奈苍生何？

9月11日清晨，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与空军司令古斯塔夫·利等将军联袂发动政变，命令军队开进圣地亚哥（智利首都）的市区，迅速占领了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军方提出，给阿连德一架飞机，请他出国。阿连德不从："……智利总统决不坐飞机逃走。正如他知道一个士兵该做什么，我知道我将如何履行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职责。"他更不愿投降，抵抗亦不坚决，起初呼吁工人上街保卫政府，随后改变主意，要他们留守工厂，保持警戒。

此前，阿连德一直对军队抱有幻想，他过于坚信智利所拥有的数百年的民主传统，足以感化、约束军队，使其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坚守政治中立——殊不知军队从来与民主无关——所以，当皮诺切特们的子弹与刺刀向他步步进逼，迫使他辞职的时候，他依然认为"军队是阻止或挫败任何政变的最有效的力量"。彼时他若放手一搏，还是可以反弹一下，毕竟在军队当中，有大多数士兵支持人民团结阵线。然而，一而再的政治误判，以及不愿分化军队令他们卷入政治漩涡，导致阿连德的落幕演出极其悲壮：这个悲情的英雄，和他的警备部队、文职人员等支持者，共计37人，与皮诺切特的步兵团及空军，在总统府拉莫内达宫（La Moneda）——一名"货币宫"——展开了激战。

上午9时左右，阿连德在临时搭建的广播站向智利人民发表最后的讲话：

"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使得智利军队放弃了传统，发动了政变……智利万岁！智利人民万岁！……我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这至少给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



如此义正辞严，壮怀激烈。比之他的同志杜布切克何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被苏联军队武力罢黜，他说：“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无法阻挡春天。”——反倒更见坚决和自信。

傍晚时分，千疮百孔的拉莫内达宫被攻陷。这场战斗的指挥官哈维尔·帕拉西奥斯将军通过无线电向上级报告：“总统死亡。”

阿连德之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自杀。据其私人医生帕特里西奥·吉洪回忆：“政变那天早晨，我和总统医疗小组的6名医生来到拉莫内达宫，当时军人已经叛乱。下午2时，他让身边人员撤离，当时只剩下他一人，他穿一套灰色衣服，手里拿着一支卡斯特罗送给他的自动步枪，坐在沙发上。我从独立大厅敞开的门里看到，阿连德正向自己开枪，在子弹冲击下，他的身体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当身体倒下时，自动步枪夹在他的双膝之间，鲜血流到地毯上。”——1971年，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智利，呆了一个月，在老而弥坚的阿连德面前，那时只有45岁的卡斯特罗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晚辈呢。他赠予阿连德的礼物是一杆冲锋枪（私人医生说是自动步枪，另有更精确的说法是AK-47，不知何者为真），枪托上嵌有黄金，上书“送给我战斗中的朋友和同志”。以刀枪为礼，实在不祥。两年后，阿连德便可能死于这支枪下。

当时任内政部长助理，后来逃到以色列政治避难的维加，著有《阿连德的陨灭》。在书中，作者称“从智利军队内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认为阿连德死于乱军的枪杀：“士兵们冲进红色大厅，遇到 5个人，并立即枪杀了他们，其中一人就是阿连德总统。后来进来了5名文职人员，有吉洪医生的同事帕里斯医生（他后来在圣地亚哥体育场被政变部队拷打致死），他检查了阿连德的尸体，发现至少有6粒子弹洞穿阿连德的胃部和下腹部。”

1973年9月11日，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肉身生命与政治生命同时宣告终结。而这一天能被后人牢牢铭记，还要等到2001年，另一场惊世骇俗的灾难爆发。这次的受难区是美国的世贸大厦。风水轮流转，遑论天灾，连人祸都不例外。不知当年与理查德·尼克松前总统一道暗暗支持皮诺切特发动政变的美国人，目睹那一片焕然一新的废墟与尸骸，是否会想起28年前，他们以帮凶的身份，将智利人阿连德送上了天堂？

阿连德死亡的这一天，原本与聂鲁达有约，一同出席Cantalao中心的揭幕仪式。彼时身患前列腺癌的聂鲁达正在临近大海、风景迤逦的智利黑岛疗养。当天凌晨，他早早醒来，从一个阿根廷电台听到圣地亚哥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顿觉不妙。他自伤身世，想起了1936年被佛朗哥法西斯政权杀害的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次日，皮诺切特的军队前往黑岛，搜查聂鲁达的住宅，试图查寻与智利共产党领导人相关的资料，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带走了聂



鲁达收藏的一些烟斗和酒。搜查之时，聂鲁达对士兵说："你们请仔细环视周围，这里唯一对你们构成危险的东西是：诗歌。"

危机重重，聂鲁达决意到墨西哥避难，他将在墨西哥城向全世界讲述智利的沧桑巨变，讲述他的亲密战友的牺牲与荣光："无数的装甲车勇敢地对付一个孤单的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等待这些军车，陪伴他的只有那颗巨大的心，包裹在硝烟战火里。"然而，这些话只能形诸文字，再也无法从他的口中说出。9月23日，聂鲁达病逝，官方说法是死于癌症。他死的前一天晚上，被注射了一剂致命的针药，据说是镇静剂。次日早晨，聂鲁达开始说胡话，然后休克。再后来，他遭遇了阿连德温暖的亡魂。

马尔克斯说："（聂鲁达）不是死于幻想的破灭，但他离去时，确实饱含深深的失望。假如他能早一点去世，他的感受会好一些。"诚哉斯言。

也许，聂鲁达与阿连德在天堂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耳际会响起旧日的吟唱：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7 陈仲丹：略论恩克鲁玛在加纳的统治


陈仲丹：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加纳国父恩克鲁玛统治时期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比较务实的独立初期和政策偏激的共和国时期。其统治后期因各种政策失误，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总体趋势在恶化，最终导致爆发军事政变。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恩克鲁玛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以及他过于迷恋泛非主义运动有关。”

一

加纳原是英国 17 世纪在西非建立的一个殖民地， 原名黄金海岸， 1957 年独立后改名。加纳的独立是当时非洲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它是黑非洲地区第一个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给当时的非洲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加纳的民族运动领袖恩克鲁玛也因此成为现代非洲史上的著名人物，享有崇高的威望。恩克鲁玛组织民族主义政党，领导殖民地人民经过 10 多年的斗争，终于通过合法的手段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然功不可没，也就成为第一届加纳非洲人政府的领导人，他组织的人民大会党随之成为执政党。

独立后，加纳人民憧憬着不久的将来自己的国家会在政治上稳定，经济上繁荣，从此走上现代化发展的坦途。而且他们是有理由抱有这样的希望的。首先，摆脱了殖民统治，解除了原先殖民者强加给当地人民政治和经济发展上的束缚；其次，当时加纳在各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还很落后，仍主要是一个农业国，依靠两三种农产品出口作为经济支柱，但它依然是黑非洲最富裕的国家。加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可出口国，锰矿石的产量居世界第四位，黄金和木材的产量也较大。因为在独立前后一段时期世界市场上的可可价格较高，每吨售价达到 247 英镑， 使得加纳政府在独立时国库充盈，外汇储备高达 2 亿英镑。 这对一个当时只有 700 万人口的非洲小国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而加纳所欠的外债只有 2000 万英镑。另外加纳还是黑非洲受教育人数比例最高的国家。以恩克鲁玛为首的加纳政府在独立前的自治时期已经执政了多年，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政府官员主要由非洲人组成，同时也得到一些英国专家的帮助，应该说这是一个称职合格的政府。但事与愿违，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执政的 10 年时期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时好时



坏，前期发展较好，而后期则每况愈下，总的发展趋势是在恶化，这真是独立时人们再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回顾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统治时期发展的成败得失，对我们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很有启示意义。

二

恩克鲁玛在加纳的统治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1957 年 3 月—1960 年 7 月，独立初期；1960 年 7 月—1966 年 2 月，第一共和国时期。 1960 年 7 月是恩克鲁玛执政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就在这时， 加纳在国内改变了国家政体，通过了共和国宪法，断绝与前宗主国英国在政体上的联系；在国际上则因不久前爆发的刚果危机，非洲的局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加纳积极参与解决这一危机而无结果。对加纳国内政治影响更大的是，在此同时恩克鲁玛改变了其决策的指导思想，从西方式的民主主义思想转向“非洲社会主义”，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转向国有制的计划经济。加纳的发展道路经历了独立后趋向激进的一次剧烈转变。

在独立之初的三年内，加纳政府在管理工作中还保持着历史的延续性，留用一些英国人在政府任职。在经济政策方面，恩克鲁玛也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其经济决策并未受其激进政治理念的影响。他主张在国内经济活动中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实行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这就是：国营经济、国家与外资合营经济、外资经济、合作制经济、小规模的私人经济。实际上仍然是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这时恩克鲁玛明智地意识到：“黄金海岸还需要许多年才能在自己的人员中找到发展和管理新兴工业方面的经营人才。”因此加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依靠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力量。对于私人企业和个人经营，恩克鲁玛也一再表示，应该使它们与国营经济一样“享有同等合法地位”。他甚至说，加纳“应该为私人资本创造一种愉快的气氛”。当时执政的人民大会党内一些比较激进的领导人曾希望通过行政管理的办法，采取发放进出口许可证的方式限制外国资本在进出口贸易中的经营活动，恩克鲁玛不同意这样做。相反，在外国公司经营的木材开采业和采矿业一度遇到困难时，政府还向它们提供无息贷款让它们能继续经营下去，以免因伐木场和矿山关闭而造成大量加纳人失业。

在独立后经济政策比较平稳的前三年中，恩克鲁玛的主要经济顾问是两个外国人，来自英国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和澳大利亚的企业家罗伯特·杰克逊。他们对恩克鲁玛有很大影响，使他相信，加纳如果要发展工业一定要有外国资本的帮助。因此在独立后恩克鲁玛就注意避免政策过激以免影响外资的引进。出于这样的原因，他顶住了来自党内的压力，不同意有人提出的要求限制外国企业、控制外汇、对银行和采矿公司实行国有化这样比较激进的经济举措。相反在 1957 年至 1960 年，政府还采取了一些鼓励外国投资的措施，



1958 年降低了外国公司应交的营业税，对新办的工厂减免税收，免收部分原料和半成品的关税，兴建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并任命了一位英国法学教授起草《公司法》。

在这段休养生息的时期，加纳大量吸收外资，任用外国技术人员，引进先进技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在稳步发展，社会也比较安定，是加纳人生活水准最高的一段时期。商店内货物充盈，食品价格低廉。全国到处都在修建道路、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在国际上，加纳是黑非洲最有影响的国家，尤其是对当时仍是殖民地的非洲地区影响更大，给了它们极大的希望。恩克鲁玛本人也享有很高的国际威望，如果这时他不改变政策，或是他的政治生涯就在这时中断，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波折，他将会被认为是有史以来非洲最伟大的政治家。

三

影响到恩克鲁玛后来政策转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深深迷恋于泛非主义思想，这是他毕生苦苦追求的一项事业，其思想来源来自于加维、杜波依斯等一些美国黑人领袖。把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与社会发展当作一个整体，最终实现统一，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美好理想，但在当时尚缺乏使之实现的具体可行的途径。而当时恩克鲁玛意识不到这一点，对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大国的崇高目标充满了希望，把加纳的独立看成只是建立全非联合政府的第一步。在《非洲必须统一》一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非洲统一国家的方案：“一个统一的非洲，即非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必须谋求实现三个目标：第一，我们必须拥有一个以大陆为基础的全面经济计划……第二，我们必须确立一个统一的军事防务战略……第三，我们必须采用一个统一的外交政策和手腕。”即实现非洲大陆的“经济计划、国防和外交政策的一体化”。[1]（P218）至于具体做法，恩克鲁玛主张分两步走，先“从组织地区性（如西非）联盟着手，逐步扩大到全非洲”。“我们可以由那些愿意创建一个核心的国家发起暂时建立一个宪政体制，并向其余非洲国家敞开大门。”到实现了非洲统一以后，“就可能出现一个巨大而强大的非洲……在一个统一的政治方向下为经济计划组织进行全面总动员而工作……我们的目标是确保非洲的尊严、进步和繁荣。”[1]（P221）

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开始试图把泛非主义的理想付诸实践，发起召开了一次次大会，邀请非洲独立国家或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参加，号召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联邦政府。他不满足于此，还主动让加纳与一些刚独立的非洲国家联合，组成国家联盟，作为实现非洲统一的第一步。加纳先后与几内亚、马里等国组成国家联盟，在经济上帮助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但加纳与这些国家发展水准不一，经济上缺乏互补性，相互之间的运输和交往也很不方便，这些联合也就没有显示出他预想中的积极意义，不过恩克鲁玛依然热情不减。但



1960 年在非洲发生的国际事件——刚果事件使恩克鲁玛深受刺激，深切感受到了实现非洲统一的不易。1960 年，比利时突然同意其殖民地刚果独立。恩克鲁玛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即欢迎刚果加入“非洲国家联盟”。他在首都阿克拉接待了刚果总理卢蒙巴，与卢蒙巴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规定以后联盟的首都设在刚果的利奥波德维尔。但很快刚果加丹加省的分裂主义分子发动了叛乱，恩克鲁玛向刚果派出了加纳的军队和警察，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帮助维持刚果治安。他还想建立一个非洲联合指挥部，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日益恶化的刚果危机，但却没有多大成效，不久卢蒙巴也被杀。新上台的刚果军政权还认为恩克鲁玛干涉了刚果内政，要求加纳人撤出刚果。刚果事件的悲剧结局深深刺激了恩克鲁玛，使他对自己从事非洲统一运动多年而成效甚微感到很不耐烦，在一次非洲首脑会议上发言时他就表达了这种急切的心情：“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实现非洲统一。机不可失，一定要现在就联合，要不就灭亡。”[2]（P284）

泛非主义外交活动的失败使得恩克鲁玛很失望，不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来访，与他探讨刚果事件，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他的刚果政策的失败是西方帝国主义破坏的结果。这一巨大的刺激激活了恩克鲁玛早年就抱有的“非洲社会主义”思想，促使他决定完全改变国内政策，用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国内的经济建设，把加纳迅速建成工业化国家，为以后进一步推动泛非主义运动奠定一个坚实的国内基础。

四

恩克鲁玛政策转变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国家改制。1960 年 7 月 1 日，加纳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除英国女王作为加纳国家元首的地位以及带有殖民主义遗迹的总督职位，由恩克鲁玛担任总统，集行政首脑与国家元首权力于一身。这是一个带有象征性的行动，表明加纳与过去的殖民时代彻底决裂。恩克鲁玛这样做目的何在？同年政府发表的白皮书透露了一些动机：“制订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在建立一个坚强、稳定、得民心的政府，以便有助于加纳实现建立一个非洲国家和领地联盟的目的……使在加纳以外与加纳人民有种族、家庭和历史纽带联系的民族加入一个统一的国家。”[3]（P60）这就是说，恩克鲁玛改变政策的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他坚持不懈追求的宏伟目标——非洲的统一。

在国家改制以后，恩克鲁玛首先要做的是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下令由他直接控制与军队、警察和国家预算有关的三个部门，并取消了司法部，设立总检察长办公室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又任命了一批总统秘书在总统监督下代行总统职能。在控制了政权和军权后，恩克鲁玛又对执政的人民大会党实行“重大改组”，免去了原任的党的总书记的职务，由他自己担任总书记。按照恩克鲁玛的说法，他这样集中权力，是因为加纳正在进入“非洲争取完全解放的一个新的政治革命的阶段”，正在进入“工业与文化革命的一个新



阶段”。在共和国建立前后，恩克鲁玛开始推行“非洲化”的政策，原先留用的加纳军队中的英国军官被全部解职，一些外资企业被收归国有，持有英国证书的加纳人法官和律师必须得到加纳法律学校的认可才能继续任职和开业。

1964年，由于国内局势恶化，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恩克鲁玛又一次修改宪法，在宪法中加入的修正条款规定执政的人民大会党为“国家党”，取缔所有的反对党，并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拥有解除各级法官的权力，有权取消法院的判决。为通过这一宪法修正条款举行了“全民投票”，据说有99.9%的投票者投了赞成票。实际上政府的电台和报刊在投票前就警告人们，投反对票的人将被看作是“反革命”。《加纳时报》发表的社论说：“在这次全民投票中，我们要提高警惕，发现谁支持我们谁反对我们。那些认为他们能隐藏在投票站的所谓‘秘密’后面愚弄我们的人必须知道，可以愚弄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些选择待在家中的骑墙派也同样该知道，人民因愤怒不会放过那些不支持我们的人。”[3]（P107）这次投票也不是秘密投票， 每个投票者领到的选票上都有编号，要求他们把选票投在标有“赞成”和“反对”字样的两个投票箱中的一个，这样就很容易查出是谁投了反对票。至于后来新成立的国民议会的议员名单是由恩克鲁玛通过广播宣布的，有不少新议员还不知道他们是在哪个选区当选的。大部分议员都是党的中下级干部，被选入议会或许就是他们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恩克鲁玛对这些议员们说：“议员们任何时候都必须记住，他们只是作为党员才成为所在选区的代表，决不能把在选区当选看成是属于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选区不是议员的个人财产，是党送他们去那儿，使他们成为议员。”[4]（P107）而恩克鲁玛则认为，这样通过多数表达出来的加纳人民的意愿，便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国家的“政治权力事实上属于人民”。

五

在经济上，在1960年宣布国家改制后，恩克鲁玛就开始进行他的“非洲社会主义”的试验。他原先就有一套独特的“社会主义”理论，后来这套理论又被称为“恩克鲁玛主义”或“良知主义”。因为受到国际事件的刺激，他的经济政策也就由务实转向激进。在建立共和国的庆典上，他明确宣布：“我个人不能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在牺牲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让少数人致富。为此，我们将转向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新生活，它将完全建立在加纳的条件和基础之上。”[5]（P207）恩克鲁玛这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要尽可能快地改变经济结构，把加纳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他还设想，国内经济建设的成功可以使加纳有更雄厚的经济力量用于支援非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帮助别的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最终推动非洲大陆的一体化。应该说这一设想的本意是不错的，但却与加纳国内以及非洲大陆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



自此以后，加纳的经济政策越来越激进。1960年12月，人民大会党在开完高层会议后宣布了实行计划经济的方案。这一方案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建立国家银行垄断黄金收购；建立销售局确定农产品价格；发展集体农场；建立国家商业公司收购各类商品。

政府在恩克鲁玛主持下制订了第一个7年计划。 这项计划明确指出："加纳不允许公共利益与个人致富同时并存"，私人经济今后"不得继续扩大其设备和经营规模"。在具体政策上国家对私人企业采取了严加限制的做法，使得不少私人企业经营困难甚至被迫倒闭，加纳的曼科阿兹渔业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家公司成立于1953 年， 1960年至1961年间用贷款从国外进口了4 艘先进的拖网渔船和捕鱼设备，捕鱼数量能满足国内市场的大部分需要，经济效益很好，与国营加纳渔业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恰好形成对比。但政府不让它继续发展，不准这家公司进口必需的机器设备，致使这家私营公司处境艰难。1963年恩克鲁玛又调曼科阿兹渔业公司的年轻经理奥克兰去国营的加纳渔业公司当负责人。奥克兰后来回忆起他与恩克鲁玛会面时的情况："总统问了我的年龄，然后对我说'你知道国家也在办渔业'，我说知道。于是他说'我要你把它接过来，把你自己的企业交给国家，我要让你当整个加纳渔业的总负责人'。我抓抓头皮，回答道这很困难，因为我一直是自己作出决定的，因此我很难为别人干活……"[4]（P164 ）最后在各种压力之下奥克兰被迫把他的公司交给国家，结果以后这两家公司经营状况一直都不好，国营公司要靠分享原有的私营企业的利润才能勉强生存。到后来国营企业的范围不断扩大，甚至连阿克拉的洗衣店也被国有化。

在限制私人小土地占有的思想指导下，恩克鲁玛在全国大力兴办农场，以此作为土地公有的非洲传统村社的再现。1961年全国只有361个农场，而到1962年就猛增至1165个。农场职工有20000万多人， 全部由国家提供住房、衣服、食物和工资。为了扶持这些农场，国家在5 年内投资达1500万英镑。从国外进口的拖拉机得不到很好的利用，拖拉机常被用来代替自行车用于去邻近的村庄买东西。没有经验的拖拉机手常把它们弄坏，又缺乏配套的拖拉机配件，没多长时间许多拖拉机就被遗弃在树丛中生锈。结果国营农场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远远落后于私人耕种的农民，农场工人几乎养不活自己，更不要说向国家交粮了。其结果是食物供应短缺，粮价上涨，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由于政府无法从农场中提取资金，于是为工业建设提取资金的沉重负担就落在了个体小农尤其是种植可可的小农头上。政府把可可收购价定得很低，以收取巨额的可可出口利润。而农民为躲避这一剪刀差的掠夺，常将可可走私到收购价比加纳高两三倍的邻国去销售。反过来政府又采取严厉的反走私政策，影响了可可农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加纳的可可产量急剧下降。



恩克鲁玛在执政的后期还积极主张大规模发展重工业，坚持花费大量财力搞壮观的大项目，以迅速实现工业化。1961 年他在对人民大会党领导人的一次讲话中说：“加纳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正在奠定社会主义得以建立的基础，亦即国家的完全工业化。假如我们不认真对待工业化和农业革命的问题，那么我们所谈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只是空话。”[5]（P213 ）为此他建立了可以远飞国外的航空公司、年产几万吨钢的现代化钢铁厂、大型炼油厂和造船厂。而这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都是些行政官员，对业务不熟悉，另外企业内由于技术和管理人才奇缺，缺乏熟练工人，原料和资金也不充足，致使这些工厂不能正常生产，即使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合乎市场的需要。在 22 家已经开工的大型国营工厂中只有 2 家能够赢利，其他厂效益都很差， 比如建在特马的钢铁厂每年需要贴补 50 万英镑才能维持正常生产。与缺少资金相比，加纳更缺的是管理经验与专业技术。当时政府用了很大的精力去筹集资金和争取外国援助，而很少顾及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时任加纳政府经济顾问的英国人刘易斯就指出：“光靠借钱给非洲人建不成一个企业，借钱给缺乏管理经验的企业家只是把钱白白丢掉。尚有潜力的非洲企业家缺的不是钱，而是管理工厂的技术知识和经验。”[4]（P147）到 1966 年恩克鲁玛政权被推翻时就已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国营企业倒闭。在 1963 年底，据加纳财政部长报告，政府向国营企业投资 4000 万英镑，但这些企业的总亏损已超过 1500 万英镑。这些企业大多成了耗费国家钱财的无底洞。航空公司开辟了远程空中航线，但客机上乘客很少。

为了解决失业问题， 政府还成立过一个名为“工人大队”（Workers Brigade）的准军事编制的劳动组织， 由城市的失业工人组成，从事一些公共工程建设，或是去国营农场种粮食。但这个政府控制的组织远不能自负盈亏，每年都要花费几百万英镑的国家拨款，却没有多少经济和社会效益。后来这个“工人大队”的一项重要工作竟然是参加各种庆典活动。比如在 1966 年初，恩克鲁玛要组织一次庆祝活动以纪念他出狱 15 周年，遂下令这个组织从全国调 5000 人来首都的黑星广场参加集会。仅为此项活动“工人大队”就化了 3 万英镑用于运输、 食宿和做咔叽制服的费用。

由于经济建设的失误，到 1964 年人民已明显地感受到物资匮乏之苦，像糖、大米、面粉、牛奶、药品这些生活必需品都严重供应不足，商店里无货可卖。那些国营商业公司“一有商品运到，只把三分之一的货物分给商店， 而把剩下三分之二的货物交给女商贩去黑市上销售”。 1965 年有一次人们在阿克拉的体育场排长队，不是为了看踢足球，而是为了买一点糖，这时体育场已被改作应急的食物配给品的分配中心。让加纳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所有能用的大部分的外汇储备都被用于建造华丽的候机大楼、豪华的会议中心、原子能反应堆、高等级公路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1965 年加纳对外



贸易已出现了 1.54 亿美元的逆差，在 1958 至 1965 年间加纳从拥有 4.8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变成了负债 10 亿美元。

六

1961 年 9 月在加纳爆发了城市工人总罢工， 起因是抗议因高额征税引起的物价上涨，而高额征税的目的是为兴建大型工程筹集资金，这时恩克鲁玛执行的极端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暴露出弊端。政府认为这次罢工是国内的反对派煽动的，故而在罢工结束之后加大了对反对派的打击力度，很快议会通过了《紧急状态权力法》，授权总统可以不与议会或内阁商量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不久又通过法案，在最高法院设立特别法庭，由总统直接任命法官，判决不允许上诉。这样严厉的镇压措施使一些反对派分子铤而走险，1962 年 8 月 1 日，在加纳北部发生了谋杀恩克鲁玛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恩克鲁玛幸免于难，但当场有 4 人死亡，56 人受伤。随即恩克鲁玛又采取了更严厉的防范和清洗措施。1965 年原反对党的领导人丹凯博士在被关押了 3 年多以后死在狱中， 在狭小的牢房里他始终身带镣铐，生了病也得不到适当的治疗。而正是丹凯在 1947 年邀请恩克鲁玛回国，出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总书记，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这时在执政的人民大会党内也出现了裂痕，党内的一些元老如伯德马等人开始怀疑甚至公开反对恩克鲁玛的政策。1951 年伯德马曾在恩克鲁玛被捕入狱时扛着他的画像走遍全国，并承担起了人民大会党的领导工作，可算是恩克鲁玛最亲近的朋友。而在这时伯德马公开反对在最高法院设立特别法庭，因为这个法庭的法官由恩克鲁玛指定，有权因政治指控判决死刑，并不允许上诉。伯德马在议会中说：“我们通过了这项法案……就扑灭了晃动的自由之火星。我们可以被人从床上拉起来，接受即席审判并被定罪，然后就要面对行刑队……今天我们可以说：事情还不坏，还没有轮到我，只轮到我的兄弟，但不久就会轮到你，不会等太久。”[6]（P475）然后伯德马给恩克鲁玛写信， 说他们之间虽然有 13 年的友谊，现在却只能分道扬镳，随后他就带着家人离开了加纳，流亡国外。

为灌输他的思想，1961 年恩克鲁玛在阿克拉郊区创建了“恩克鲁玛意识形态学院”，仅校园的建筑费用就化了几百万英镑。政府部长、党内干部、行政官员和议会议员们都要到那里去参加学习班，学习“恩克鲁玛主义”。1965 年，他重组了内阁。在这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体内阁成员送到恩克鲁玛学院里去学习 3 个星期的恩克鲁玛主义。

到恩克鲁玛统治的末期他甚至疏远冷落了支撑其政权的军警势力。因发生谋刺事件在警察中进行清洗时他解除了很多高级警官的职务，并在东德教官的帮助下组建了一支装备有精锐武器的总统卫队。而正规军却装备低劣，官兵待遇也远不如总统卫队，对军人的津贴越来越少。他们都有怨言，“有一天我们必须为用电付钱；第二天又被取消了训练津贴；再



一天又没有了旅行的补助。我们真不知道又有什么事要落在我们身上。”[7]（P2）到1965年底，恩克鲁玛与军队的关系更加恶化， 他怀疑一些高级军官的忠诚，命令军队的两名最高指挥官退役。这件事激怒了军队。1966年2月， 加纳军警趁恩克鲁玛出国访问之机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执政近10年的恩克鲁玛政权。从此，恩克鲁玛一直在国外流亡，直至1972年在罗马尼亚去世。

七

恩克鲁玛是20世纪中期最有影响的黑非洲领袖。他领导加纳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同时他也激励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但他同时又是一位失败的加纳领导人，过于迷恋建立一个以他为首的非洲合众国，严重背离了加纳和非洲的实际，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目标，在国内又无情镇压反对派势力，推行极端的经济政策，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到1966年政变爆发前，加纳已成为一个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贫困、外交上孤立（不少国家怀疑恩克鲁玛建立非洲统一国家的动机）的国家。1966年政变的一个领导人阿曼克瓦上校对恩克鲁玛的一生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恩克鲁玛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一开始干得很好，领导了独立运动，代表加纳成为崛起的非洲的象征。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变得野心勃勃了，大搞个人崇拜，冷酷无情地玩弄他自己制订的宪法赋予他的权力。他对绝对权力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爱好。”[8]（P379）

正如上文所说，恩克鲁玛在加纳统治的转折点是在1960年国家的转制，建立共和国。从表面看，促使他改变政策的直接因素是他太热衷于泛非主义运动，在这一运动受挫时则断然在国内实行脱离实际的激进政策，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最终能以加纳为核心实现非洲统一的理想。他把建立非洲一统的世界大国当作最终目标和最高政治理想，认为“非洲统一的目标是至高无上的”，要让加纳这样的西非小国承担起领导全非洲的艰巨重任，使他个人和国家都耗费了过多的精力而毫无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加纳的现代化发展。

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深层分析，可以发现产生这样的悲剧结局又与恩克鲁玛甚至与他同一时期的一些非洲领导人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有关。在曾经成为欧洲列强殖民地的非洲国家，所谓历史遗产包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和前殖民者留下的西方文明的遗产。如果在独立后，获得新生的非洲国家能正确对待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历史遗产，吸取其中有益的成分，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是能够找到一条适应本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加纳传统土著文化对恩克鲁玛的影响。在加纳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的是内地的阿散蒂文化，阿散蒂人曾建立过强大的阿散蒂王国，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阿散蒂战争，其势力在加纳影响很大。而恩克鲁玛出生在受英国影响较大的沿海地区，又在西方国家学习多年，对阿散蒂人的文化是较为隔膜的。加之在独立前后，为了争夺政

治权力，阿散蒂地区的大酋长一直要求分权，甚至一度反对独立，与恩克鲁玛领导的人民大会党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因而在独立后，政府一直在遏制传统酋长的势力，打击当地的反对派力量。这样恩克鲁玛就很难从当地传统的历史遗产中吸取到多少有益的成分，不免在决策时往往会脱离当地的实际。

另外恩克鲁玛原先在天主教教会学习，后来从 1935 年至 1947 年又长时期在美国、英国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对西方国家本来是相当了解的。但一则因为他在国外期间深受泛非主义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影响，二则因为他后来回国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殖民当局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曾被捕入狱，被判徒刑，这样就使得他在实现独立后很容易对殖民统治者留下的历史遗产持否定的态度。在对本土与外来的历史遗产两无依归的情况下，他就很自然地转向了泛非主义以及他自己创立的“非洲社会主义”（即恩克鲁玛主义），将之作为国家努力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带来了连他本人也未料想到的严重后果。

研究恩克鲁玛在加纳统治的成败得失，不能不让我们想到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以前曾是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如何看待殖民统治以及与之相关的殖民统治的遗产？显然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甚至也影响和阻碍了这些地区独立后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能对历史遗产包括殖民统治的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因否定殖民统治进而否定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东西，就像倒洗澡水把澡盆里的孩子也倒掉了一样。比如西方国家尤其是前宗主国所拥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甚至政治体制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另外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争取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及保持与有关国家的传统贸易关系更是必需的。不能因对殖民统治的恶感而趋向极端，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或者在国内实行过于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使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走上弯路。我们可以看到，恩克鲁玛统治时期的一些失误就与不能正确对待殖民统治遗产的态度有关，这正是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

【参考文献】

[1] Kwame Nkrumah. Africa Must Unite [M].London,1963.

[2]唐大盾.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

[3] Thomas Howell, Jeffrey Rajasooria. Ghana and Nkrumah[M] .New York,1972.

[4] Trevor Jones.Ghana’s First Republic 1960- 1966[M] .London,1976.

[5] Adu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M].London,1975.

[6]布赖恩·拉平.帝国斜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7] Robert Pinkney. Ghana under Military Rule 1966-1969[M] .London,1972.

[8]戴维·拉姆.非洲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5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8 萧功秦：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戊戌变法（节选）



萧功秦：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变法者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妨碍了他们做出理性的政治决策；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在官僚体制内从事变法的经验，从政前大部分时间在在深山里读书讲学，实际上始终处于政治上的边缘状态。

”

康有为梁启超这样一批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由于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迅速地成为激进的变法派，并在同样承受着焦虑压力的青年皇帝的青睐下，迅速地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心，成为清帝国变革的主导者与策划者。他们和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新的精英势力。这些少壮派变法人士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改革热忱，具有比洋务派精英更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世界眼光。

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心态上的危机感和他们强烈的焦虑感妨碍了他们做出理性的政治决策，正是在这些激进变法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 100 天的时间里，发布了近 300 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都不配套。变法派以一种迅速的、彻底的、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变革。这样，他们势必会过多地触犯到广大的官员的实现利益。实际上，一场官僚体制下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改革派能否获得广大处于中间状态的温和派的支持，以及能否让既得利益者保持有限支持或中立，只有这样才能使反对变革的保守派在官僚中被孤立起来。然而戊戌变法的实际情况却是，极端反对变革的顽固守旧派（例如徐桐、倭仁等人）、曾经一度有限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慈禧与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鼐等人）这三种政治势力，却在反对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派的过程中，形成了“神圣同盟”。实际上，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在变法失败以前，在给自己友人的一封信中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在信中批评康有为的激进做法是“规模太广，包揽太多，举行

太大，同志太孤，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②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透露出激进变法战略是变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在官僚体制内从事变法的经验，在从政以前，他们远离政治中心，大部分时间在在深山里读书讲学，实际上始终处于政治上的边缘状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做过一天官。相对于其他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他们的热忱、血性、高调与张扬的行事风格，使他们在庸常的官僚群体中鹤立鸡群，并冲破层层官僚体制的阻力而引起皇帝的注意。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事风格，在甲午战败，危机来临，而又朝中无人的特殊情况下，恰恰又引起同样充满焦虑感的青年皇帝的注意，他们从皇帝那里获得了政治上极其罕见的支持与信任。然而，当这些书生政治家在皇帝支持下进行变法时，他们自身缺乏在体制内实行改革的经验这一严重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他们的大言高论与咄咄逼人的行事风格，与人们对传统官僚的角色期待大相径庭，这就使他们在群臣中十分孤立，备受讥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官僚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水平之低，远远超过后人的想象。只须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地纸上谈兵，书生误国了。

一个例子是，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折，建议朝廷下诏，要求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也穿西装，只有穿了西装，人的精神面貌才显得焕然一新，从而可以使变法取得成功。直到多年以后，康有为才给梁启超的信中坦言，当时怎么会想出如此不切实际的办法来，他的信中写道，如果真让全国农民都穿洋服，那么乡村里织的土布卖不掉怎么办？当然这是后话。③ 另外一个例子是，康有为提出，变法不是需要大量钱款吗？其实筹措这大笔款项并不困难。既然英国对西藏垂涎三尺吗，朝廷就可以把西藏这一片毫无用处荒蛮之地卖给英国，就像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一样。这些变法派还提出全国要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的建议。这个天文数字不是根据中国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而是根据康有为“量出为入”预算方案倒推出来的，康有为的方案是，海军与陆军建设需要2亿两，三大铁路建设需要3亿两，1亿用于其他各项开支。④ 康有为居然完全不考虑当时中国农民是如此穷，而且清政府又如此缺乏信用，全国一年总收入只有1亿两，怎么可能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

戊戌变法的不切实际的激进主张引起了包括保守派、既得利益者与有限支持改革的温和派在内的广大官僚群体的不满。康有为在变法危机来临时，不但没有及时改变激进策略，反而在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假借皇帝的假圣旨，孤注一掷地要搞一次注定失败的包围颐和园的政变。最终引起慈禧的反政变，导致这场变法以悲剧告终。当时，严复在对变法派深表同情的同时，相当尖锐地指出过，康梁变法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⑤，这一判断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



这里有一个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危机压力下而获得的千载难逢变法机会，却恰恰是由一批完全缺乏最起码的政治经验的书生型的知识精英来主导？这里可以反映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深刻的两难矛盾：一方面，由于传统专制集权的儒家官僚体制实在太封闭了，一个官员在这个体制中生活得越久，阅历越丰富，他在体制越能游刃有余地适应官僚环境，那么，他也就越是习于所安，承袭旧章，感觉迟钝，越是缺少变革的意愿、知识与能力，换言之，他们就会在这一体制内就会变得越保守，越是无法适应环境的挑战。另一方面，只有那些较少与这一官僚体制有关联的边缘知识分子，才能不受体制规矩的约束，用我们的话来说，不受专制官僚文化这一“大酱缸”的浸泡，能在实际生活中，发展出新的思维与接受新的价值，并具有更敏锐的世界眼光，然而，此类体制外的边缘知识分子又同时具有另外一种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正因为他们与体制无关，缺乏在体制内的经验与实际政治磨练，当由他们来主持变革时，他们却缺乏必要的官僚经验来进行有效的变革。

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在官僚体制内有经验的人，在这一体制中能游刃自如的人，能通晓这一体制的游戏规则与潜规则的人，却在这个体制的大染缸里丧失了变革的愿望与热情；相反，那些体制外的保有改革的朴素愿望与热情的人们，却没有在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任何经验。这正应验了当时一位士绅在给皇帝奏折中的一句话“默察京师大局，其老成者苦于素无学术，其新进者又苦于未经历练。有’有君无臣’之忧”⑥。这一奏折是以变法开始以前写就的，后来的历史却由它不幸而言中了。这是中国专制官僚体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两难悖论。

注释：

② 康广仁：“致易一书”，《戊戌六君子遗集》。

③ 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 475 页，商务印书馆 1937 年出版。

④ 同上。

⑤ 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三册，第 533 页。

⑥ 郑孝胥：“总理衙门章京郑孝胥折”，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 11 页。

（文章来源：《领导者》杂志总第 16 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 方可成

编辑：刘岩川，常仁豪

设计：潘雯怡，季文仪

校订：施钰涵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